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臺灣人類學刊 22（2）：137–196，2024

追蹤「田野照片」檔案的社會傳記：
顯影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草創期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

林文玲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自1955年8月至1965年4月，經歷10年的籌備、規劃到正式成立，期間曾動員全所人員、實施多次百科全書式的臺灣原住民族實地調查，並拍攝近5000張的黑白田野紀錄照片。參與田野調查的人員隨後亦積極彙整田野各種類型材料，並藉由研究論文或民族學專誌，進行學術發表。單篇專題研究論文多發表在《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由參與集體實地調查人員共同撰寫的民族學專誌，則歸屬在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類別的出版品。無論是臺灣原住民族專誌，或發表於《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主題的研究論文，皆立基在前述實地調查蒐集而來的豐富田野材料進行撰述，並多方採納田野工作當下所拍攝的紀錄圖像。這一時期的研究著述透過文字書寫與照片圖像兩者的協力共作，程度不一地承載並揭示田野調查的過程及結果，並於分析撰述當中遞送人類學的議題思辨、概念探討以及理論鋪展。所有這一切紀錄並形塑了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期間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以及該機構的社會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初期發展之樣貌。本文試圖回溯這一段學術構建之初始身影，並將從文字論述為中心的分析視角稍微偏移，轉而著重1950至1960年的「田野照片」社會傳記所涉及的事件與行動者及其互動效應，探析照片圖像於學科塑形以及知識形成的不同環節，所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以及從中透顯的科學／學科願景。

關鍵詞：民族誌攝影，照片檔案，物的社會傳記，訓練有素的眼光，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顯影

投稿日期：2022年4月19日　接受出刊日期：2022年9月5日
* 謝詞：由衷感謝本專號籌組人劉斐玟的召集，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建議，推促本文的構思、書寫及修訂更為清晰與完備。

一、中研院民族所草創期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自1955年8月至1965年4月，經歷10年的籌備、規劃到正式成立，期間曾動員全所人員、實施多次百科全書式的臺灣原住民族實地調查，並拍攝近5000張的黑白田野紀錄照片。[1]前述田野工作的進行，秉持搶救人類學的初衷與做法，透過團隊合作方式，分派參與成員不同主題與任務，進行訪談或參與觀察，蒐集口頭以及觀察性資料。實地調查資料之採集在文字或聲音媒介之外，亦借助照相機紀錄田野工作現場的人事物，從而積累頗具規模的照片集結。這些田野現場以及調查活動的紀錄照片，圖像內容若循著底片曝光之先後進行閱覽，通常依序包括該次田野探查之部落（的遠、中、近景），部落周圍的自然與環境景觀，例如樹木、植物、花草，人物、祭典、農具、漁捕器具、獵具等物質文化物件，以及建築房舍，雕像，編織，器皿等。

在10年設所籌備期間，中研院民族所推動的民族學田野調查，蒐集包括文字、聲音、圖像及圖表等數量可觀的各種類型田野材料。參與田野調查的人員隨後亦積極將田野材料給予整理、彙整為資料和初步分析之後，藉由研究論文或民族學專誌，[2]進行學術發表。研究論文多半出自單一個別作者，而民族學專誌則糾集調查團隊參與成員，委任每位各自負責某一主題章節，進行撰述。民族學專誌涵蓋多個主題其內容較專題研究論文更為廣泛，並提供關於某一主題更為豐富而細節的記述與描繪。一般而言，民族學專誌從撰寫到出版，比起研究論文需要更長的醞釀期以及工作時間。中研院民族所這一時期無論是民族學專誌或研究論文，皆合併田野照片圖像進行研究成果之發表。單篇專題研究論文多發表在《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以下簡稱《集刊》）；由參與集體實地調查人員共同撰寫的民族學專誌，則歸屬在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這一類別的出版品。

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植基於實地田野調查蒐集而來的各類型材料，分別藉由主題取向的研究論文，或者透過對某一族群文化進行整全面貌的民族誌描述，發表研究心得。前述兩種類型的學術產出，

1　2020年5月的照片數量統計。

2　當時發表在《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無論是「初步調查報告」或「田野紀要」，下文一律以「研究論文」給予表述。

各自符應著具時空脈絡、氛圍的社會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或民族誌實踐之不同旨趣與學術嘗試。社會文化人類學／民族學通常指涉作為一門學科和它的整體研究。而民族誌則著重田野材料的蒐集，與方法論和各種方法的運用高度相關。田野資料的蒐集是民族誌一詞的動態表述；田野資料匯整之後形諸文字、動靜態圖像或數位媒介的成果發表等成品呈現，則是為民族誌的名詞狀態。簡言之，社會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研究與民族誌於知識生產過程，是處於不同階段與進程，並在知識的形成當中扮演各自專長之角色，卻同樣都是構成人類學學科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民族誌工作者藉由文字、圖像或者數位媒介呈述其田野材料時，或多或少總會援用當時代的人類學理論，進行鋪陳或給予解釋。而人類學研究及其相關著述，則大多立足在扎實的田野調查。於此，民族誌田野調查與社會文化人類學／民族學理論、論辯之間是有著積極的關聯。也因此，中研院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的臺灣原住民族專誌，以及《集刊》當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論文，在豐富的田野材料，包括紀錄圖像的協力之下，程度不一地承載並揭示田野調查的過程及結果，並於分析撰述當中遞送人類學的議題思辨、概念探討以及理論鋪展。所有這一切紀錄並形塑了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期間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以及該機構的社會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初期發展之樣貌。本文試圖回溯這一段學術構建之初始身影，並將從文字論述為中心的分析視角稍微偏移，轉而著重民族所1950至1960年「田野照片」檔案的社會傳記，探析照片圖像於學科塑形以及知識形成的不同環節，所扮演的角色與發揮的功能，以及從中顯露出來的科學／學科願景。

二、透過著述出版首度集結的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

> 有關臺灣土著文化的研究工作〔在民族所籌備處成立後的十年間〕亦極為活躍，從事田野調查工作五十餘次，所發表的論文亦相當多。例如本所的集刊，從第一期（民國四十五年春季）至第二十期（民國五十四年秋季），共計121篇論文，有關臺灣土著文化研究共有56篇，幾乎佔總篇數的二分之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76：5）

隨著50多次實地調查的推動，同時亦拍攝田野工作實施當下的紀錄照片圖像。此些田野現場的照片圖像，隨後透過單篇刊載於《集刊》的研究論文，以及多人合作撰述的民族學專誌的陸續出版，而有了許多現身露臉的機會。這一時期刊載於《集刊》上的論文，運用不少照片圖像，以多方協助「說明」或呈現研究對象、地點、人事物以及物件等。《集刊》創刊第1期收錄有4篇論文，由161頁內文以及33頁圖版所構成，內文與圖版頁數比為5：1。而4篇論文中涉及臺灣原住民族的研究即有3篇。以3篇之中的〈來義鄉排灣族中箕模人的探究〉（李亦園 1956）為例，35頁的全文當中包括29頁內文，6頁圖版。圖版頁則1頁手繪的「部落略圖」、1頁「巫師法器」與「網袋」4幅照片圖像，以及4頁共12幅的田野照片圖像。

研究材料同樣源自民族所10年籌設期的集體實地調查的臺灣原住民族專誌，衛惠林與劉斌雄在1962年出版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為此系列專書專刊的首發著作。這之後的10年間共有21本專刊著述的出版，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主題的專書專刊則有11本（請見附錄）。這11本民族學專誌亦多所運用照片圖像於文字撰述的內容章節當中。一般而言，物質文化主題的專書專刊使用照片圖像的比例，較高於社會結構議題的專書專刊。總括而言，民族所10年籌備期所推動的集體實地調查，著手社會文化各個面向、百科全書式、整全觀的文字、聲音、圖形、圖表等各類型田野材料的蒐集。這些材料亦為後續研究出版奠立了良好的基礎，而文字媒介為主導的學術書寫合併照片圖像，一同鍛鑄這一時期社會文化人類學以及民族誌研究作為經驗科學／學科的實質與內涵。

照片圖像為當時學者多所運用、合併至學術著述的蓬勃趨勢，在1965年民族所正式設立，並調整其實地研究工作目標與方向之後，開始有了明顯變化。「臺灣原住民族土著社會已不再是唯一的研究目標，新拓展的重要研究領域涵括臺灣漢人社會以及東南亞的華人社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76：5）。除卻實地田野重點、區域以及領域的轉移之外，學術之目標與任務亦因應劇烈變遷中的社會文化，尋求社會科學研究積極回應社會議題與現象的應用途徑。

> 臺灣土著原有的社會文化正處於急劇的變遷中，要研究急劇變遷的社會文化則不能完全依靠傳統民族誌方法，必須尋求理論、方法及研

究目標的新途徑；在尋找新途徑的過程中，造成與早期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有所疏離，而〔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因而〕顯得相當沉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76：7）

民族所於成立之後的第二個十年間，臺灣原住民族研究一則因為該所實地研究區域的重心移轉，而退居後座。再則，這一時期的學科研究旨趣從整全觀的民族誌方法、視角以及著重之現象，轉換其關注而致力於問題、現象的聚焦分析與歸納，以及隨之而來的理論之演繹與論述之精煉。與此同時，合併照片圖像的研究出版漸趨沉寂。換句話說，文字與照片圖像協力共作，呈述民族所研究人員學術論述之實踐，1950至1960年代期間是其興盛時期，照片圖像經由前述研究出版而活躍一時並有了「集結在一起」的現象。這之後，隨著研究旨趣的轉移，這一批照片圖像進入了「休眠」狀態（林文玲 2022：138），爾後透過民族所對其機構所收藏的學術著作、研究資料、影音資料以及標本，進行了實體收藏以及資料建檔。2002年開始，這一批1950至1960年代實地調查所拍攝的照片圖像，藉由「臺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畫」，從實體轉向虛擬之數位典藏，並將其歸屬在「田野照片」檔案名稱之中。

綜上所述，本文將藉由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檔案之圖像，從田野現場拍攝、攝影圖像形成階段，到照片圖像如何被選取、進入以文字為主體的研究書寫過程，及其構造內蘊時空脈絡、情境意涵及論述特色的學術產出，進行梳理。因應前述議題的探討，本文將藉由物的傳記方法（Kopytoff 1986: 64-91），去演繹這批「田野照片」檔案在這一時期特別凸出的社會傳記面向（Stylianou-Lambert 2019: 379-380）。[3]聚焦照片檔案物件的社會傳記，首先針對1950至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的「田野照片」檔案，在何種意圖的驅動之下而被創建，為了哪些目的而被產出，由誰拍攝，以及當時研究人員如何將它們合併、運用到不同行文脈絡之中、發展其研究想法或完備其論述主張，並且在什麼樣的框架／媒介當中集結而成為檔案，給予整理。另一層次，本文將分別

3 事實上攝影圖像在其生命史的各個節點，都存在著譬如社會傳記、物質傳記或價值傳記等多個平行傳記。

就攝影圖像作為紀錄的技術（recording technologies）以及作為呈述／再現的技藝（visual representational technologies）之不同視角，去認識、釐清攝影圖像在認識論，說明、闡述意義，以及論述之構成上，所承擔的任務、發揮的功能以及產生的效應。

三、照片檔案的社會傳記

攝影圖像於民族誌田野以及人類學知識構成或呈述／再現當中，通常附屬於文字語言，扮演幕後功能或協助的角色。然而，能夠與文字語言的表述協力共作、互為表裡，還在於攝影圖像本身的表意能力和意義實踐。攝影能夠有別於虛構而發出某種「真相」（Renov 1986: 71），是因為攝影作為紀錄的技術，展現某種情況的事實；至於展露、揭示了何種樣態的「真相」、「事實」則繫於攝影作為呈述／再現的技藝這一面向。田野工作的紀錄攝影則不僅止於透過圖像發出某種真相事實，紀錄鏡頭框限的環境與周遭，指涉的脈絡、氛圍，是與歷史連出某種關係。此種攝影實踐與真相、事實以及歷史的關聯與指涉，與民族誌田野工作有一些共通點與相似之處（Ball and Smith 2001: 303）。因此，若反過頭來檢視實地調查當下實施的田野紀錄攝影它的過程以及經驗，可能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去理解民族誌田野調查的實踐及意涵。

以此延伸，轉載至研究論文或民族誌書寫的田野照片圖像，預期將發生攝影僅僅「紀錄事物」之外的效用轉變，而有其表意、知識形成以及意義效應。這指出攝影圖像作為視覺呈述／再現之技術，有能力引導或調撥讀者與研究書寫所指涉的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此外，攝影的發明及其出現的時空脈絡，正好也是人類學作為一門學科開始發展的時空脈絡。Christopher Pinney（1992a）觀察並提出人類學與攝影之間有種並列平行的發展現象，並認為兩者約莫出現在同一時期、同一地點，也就是十九世紀下半的歐洲（亦見 Becker 1974: 3），所以它們也都烙印了當時籠罩在該社會中的現實主義色彩。James Clifford（1988）亦呼應前述說法，並且進一步指出，早期的民族誌實踐引用圖像性資料，正是因為人類學本來即是現代性的一項產物。換句話說，人類學與攝影兩者皆為現代性之產物，它們也都共享了現實主義風行的時代氛圍（林文玲 2002：8）。

攝影，基本上內建著「西方社會議程、觀視位置及其照見明晰現實的中央透視法」（林文玲 2013：157），組構形成的一套機制。而早期用作紀錄實地調查的攝影，多少亦夾帶通過這項機制所表露的觀看方式，以及由此構築連接現實／世界的一些途徑。進一步去梳理因攝影而來的觀看方式，及其與現實／世界產生的關聯樣態，從中能夠顯示這些攝影實踐與攝影圖像如何反映理論，以及它的認識論傾向。亦即，本文一則關注攝影圖像的社會傳記；二則去辨識它們現身、露臉以及存活的環境，也就是攝影圖像出現的場合、肌理、脈絡、上下文以及座落的不同尺度及框架等。前述研究關注，借助視覺社會學者Theopisti Stylianou-Lambert（2019: 378-379）提出的攝影生態系統（photographic ecosystem）之理論框架，預期能夠更為紮實地展開。

攝影生態系統的照片圖像之檔案傳記研究，留意攝影／事件當中的人與非人參與者、環境、攝影物質、圖像（images）和圖片（pictures）的交織以及形成的網絡。由此而來，攝影生態系統提供照片圖像存活的必要肌理、脈絡，建議用途並為圖像的解釋、詮釋提供依據。從形式／框架上而言，攝影生態系統包括實體或數位檔案、家庭相簿、藝術市場、展覽空間、報紙、社交媒體、照片共享應用程式等。而對攝影圖像於前述不同形式／框架上的流動、相互嫁接或移轉的追索，顯然溢出既有對照片之內容、圖像再現的探討模式，而偏移至對照片、圖像、圖片、物質、介面、流通、管道，以及人與（譬如類比或數位）環境的關注。此外，「攝影生態系統不僅將照片的流動視為物質實體，並且將賦予照片意義的技術及結構囊括進來；並且認為技術與結構並非既定與被動，它們對於照片的意義生發起著積極作用」（Edwards 2012: 223）。

技術、結構、物質及移動形成了某種樣態的攝影複合體（photography complex），同時讓它有了「新的能動形式」（novel form of agency）（Hevia 2009: 81）。這項攝影複合體通過攝影關係的集結、組裝，糾纏進入攝影圖像的意圖與實踐當中，並且在關係的演變中，動員新的物質實在（new material realities）（Edwards 2012: 223）。這如同Costanza Caraffa（2019: 15）所言，如此才能將照片作為物質實體所夾帶的認識論潛能發揮出來。承前，本文將援用攝影生態系統的理論構框，追蹤1950至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創所期間實施的實地調查攝影，以及後續合併這批田野照片圖像的研究出版。亦即這時期該

批照片圖像作為物的文化傳記，[4]在它的諸種平行傳記（譬如物質傳記或價值傳記等）當中，特別顯著發展的社會傳記面向。

社會傳記的概念可以包括各種「事件」以及與「行動者」的互動，這些互動決定了攝影檔案的內容、物質性、價值、用途和敘述方式（Stylianou-Lambert 2019: 379）。藉此，本文對於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檔案社會傳記的探討，在「事件」的部分主要就實地調查與文化書寫／研究著述兩方面進行梳理；與前述兩事件對應的行動者包括有實地調查人員、攝影人員、研究人員、論文撰述者及書刊編輯者等。兩事件與各自產生互動關係的行動者，對「田野照片」檔案在內容、物質性、價值、用途和敘述方式所產生的影響，是本文試圖釐清的重點。

基於上述想法，本文聚焦攝影（圖像）及其在不同生態系統當中位移，與其他技術、結構、物質等彼此遭逢、發生關聯，進而從田野到識／視野的轉置與變化，以及開啟、構連的知識與理解。下面將由研究方法、方法論以及呈現人類學知識與生產的不同階段著手進行。亦即分別從人類學的調查、田野工作，以及再現／呈述兩個向度，對三個問題進行探討：首先，相機如何幫助人類學民族誌田野工作（民族誌的動詞狀態）的實施和資料之蒐集？其次，田野（攝影）資料怎麼被合併進入民族誌書寫（民族誌名詞狀態）或專題論文的著述當中？以此呈現何種樣態的人類學知識／視野？第三，前述兩個不同卻相互關聯的知識生產活動，所揭示、接近的現實／世界，視覺在此過程中起著什麼樣的作用？

四、實地調查的田野紀錄攝影

民國四十三年，中央研究院遷至南港，當時因鑑於臺灣島上土著族群豐富的文化傳統，實為民族學研究難得寶庫，同時又基於十數年來民族

4 Igor Kopytoff在“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一文，開宗明義提出從文化的視野去理解商品，並認為「商品」是暫時的存在，並非是永久不變的物件（商品）。亦即，Kopytoff 將「商品」放置在物的文化傳記的軸線上，重新探討經濟學家眼中單一的商品它的多元性（Kopytoff 1986: 64）。從文化傳記視野亦將展示某物件它的意義與價值，是如何通過人類活動進行積累和有所轉化。

學組已有之成果，乃於四十三年十二月的院務談話會中，決定單獨成立民族學研究所，以便於從事臺灣土著族群文化的調查研究及中國文化史之研究。民國四十四年八月一日，先行設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聘請曾主持本院民族學研究工作多年的凌純聲博士為籌備處主任。……民國五十四年，亦即籌備處成立後的第十年，民族所獲准成立，由凌純聲先生出任首任所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976：1）

接受歐陸系統民族學訓練的凌純聲，1928年自法國取得民族學的博士學位之後，隨即受聘位於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研究員，隨後1930年前往中國東北邊疆進行赫哲族實地田野調查工作。凌純聲赫哲族調查活動咸被認為是中國第一次的科學田野調查（李亦園 1970：2；陳其斌 2008：39），立基於此次田野調查所產出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純聲 1934）則是中國民族學研究史上的第一本「科學民族誌」（李亦園 1970：2）。[5]這一本民族誌的「科學性」在於它是建構在歷時三個月對當地生活狀況與社會情形的調查基礎上（凌純聲 1934：1）。

1955年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之後，凌純聲隨即帶領所方人員，著手民族學研究各項工作及業務的推動。研究工作著重兩個方向進行，一則研究中國古代民族文化與太平洋土著的文化接觸關係；二則積極從事臺灣原住民族的調查及研究活動。這些田野調查活動，早期多半是民族所全所人員出動，到達田野地點、一起工作並分頭蒐集各個社會文化項目的資料。實地調查的實施延續凌純聲之前中國少數民族研究發展出來的民族誌田野方法，對於資料的蒐集和紀錄等，都有清楚而明確的方向以及工作指示。關於田野工作的具體方法及守則等，檢視凌純聲彙整出版的《民族調查表格》（凌純聲 1935）以及〈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凌純聲 2003），可以有一些認識及掌握。

〔實地觀察〕這種方法是根據從具體而抽象的一原則來的。例如研究社會組織，在開始的時候，不要問那些普通的法律，而要問村莊的名

5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書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四，分上下兩冊，694頁，插圖有332幅。

稱和部分。先打一個地方圖樣，再找出各部分住民的姓名……畫一個部落疆域圖，寫明部落分區或民族區域的界限。（凌純聲 2003：11）

實地「觀察」不只著重眼見為憑的資料，亦包含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言語交流。透過田野場域之現場、實體以及面對面互動，民族誌學者於實地觀察與報導人之間互動的同時，透過紙筆記下他的所見所聞。「田野調查筆記宜詳盡，並且應當立刻將各種見聞記下來。我們固然可以從回憶中記下風俗、儀式、制度等空泛和約略的記載，但是若要得到準確而詳盡的知識，必定要立刻詳盡地記下各種報告」（同上引：10）。實地見聞之速寫、註記若要更為全面地予以掌握，凌純聲認為，透過畫圖以及圖樣媒介應是一個有效的方法與途徑。然而，田野速記、筆記當下的畫圖、形成的圖樣，事實上也能夠協助田野調查人員事後更有憑藉地去回想、回憶田野的種種甚至細節之處，並將田野各種聽聞更為豐富、更有肌理地給予記述及謄寫。

「詳盡記下」的動作其旨趣不只在於資料的正確以及科學性，也關乎這些資料是否足夠將田野對象以及他們的社會文化的現實（reality）呈現出來。而「記筆記的時候，不僅記載所得的報告，並且要記下所聽到報告時的背景情形，〔這〕可以在腦筋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同上引：10）。對於「背景情形」的記述與印象烙印及喚起之間是有著正比、疊加的作用。由於「印象」浮現腦海多半以圖像樣態出現，「印象」的運作有如一幅畫、一張圖片。一幅畫是一種框定的記憶，一張圖片則讓我們超越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重溫多年前曾經的某一時刻。確切而言，民族誌田野調查傳統的開啟，使得研究對象以及他們的文化變得「可見」、「可以聽聞」，田野工作人員也得以真實地「遭遇」、「觸摸」到這些遙遠地方的「他者／文化」。

早期的田野實地調查相較於之前運用二手資料的研究方法，看似解決了安樂椅上人類學家在書房內埋首資料堆的「隔空」調查，卻無法「真正」觸及研究對象的問題。然而，田野實地調查之於人類學「他者／文化」的知識生產作為一種「可視性」遭遇，對其謄寫、轉錄、呈現以及呈述／再現的整個過程，卻只解決了部分問題。人類學文本的受眾及讀者，通常未有機會處身田野實地，即使透過田野工作者詳細的文字描述，於閱讀當下仍然缺乏趨近文本所描

繪的異地「他者／文化」及其人事物的視覺線索（MacDougall 1997: 276）。此外，文字主導的人類學著述，經常基於科學性理由，用字遣詞力求清楚簡潔，行文當中不多作描繪，亦避免文字過度渲染。如此將可能抑制讀者閱讀時「畫面」的浮現或構築，導致難以接近被書寫主體與主題，從而產生理解上隔閡。換言之，研究人員和他們的閱聽眾兩造，藉由文字文本的「接引」，卻還不足以解消遙遠地方、陌生「他者／文化」可視／見性問題。反觀攝影圖像所具備的「反映」、「凝結」鏡頭前對象的形體、樣態的能力，相當程度為「他者／文化」可視／見性帶來一些積極可能。

承上，以下梳理1950至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集體實地調查，以及田野工作現場的照片拍攝。這一時期的田野工作以及實施的田野攝影，其總體方向與目標之擬定，田野工作方法的運用以及實際操作，多出自於民族所籌備處主任凌純聲的指導及引領，並委由負責各個計畫的主事者循序展開。當時凌純聲帶領的臺灣原住民族集體田野調查，面對研究對象正處社會文化的急遽變遷，因而以組織團隊的方式進駐田野，並讓研究人員分頭蒐集該社會文化各個項目的整全性資料，以落實文化搶救的人類學調查。對於快速消失、變化中的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攝影機被認為能夠確實紀錄並保存大量的資料與訊息，因而成為調查研究工作的重要、必備工具。

（一）田野調查技術要點

凌純聲在其《民族調查表格》（凌純聲 1935）以及〈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凌純聲 2003）幾處地方提及繪圖、攝影的運用，雖然並未詳細說明運用的方法，卻依然可以感受到繪圖、攝影圖像方法的重要性。下面段落聚焦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的集體實地調查，並嘗試從《民族調查表格》以及〈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爬梳那一時期在田野工作的過程中，對攝影的實施、可能依據的方法或原則，以及希望藉此達成的研究目標。凌純聲在其編撰的《民族調查表格》（凌純聲 1935）對於包括繪圖、地圖以及攝影方法之條目，整理如下表。

《民族調查表格》中關於攝影、照片或地圖、繪圖之條目

項目	編號	條目內容	頁碼
一、地理與統計	6	將地圖中之界線與該地方民族學上之實況比較後繪一草圖說明之。	1
二、住處與設備	30	住宅之圖樣：平面圖、正面圖及側面圖，最好依百分比例。	2
	50	各種不同之房屋須詳細說明，並附照片尤佳。	2
	59	中樑及屋頂各部分之名稱如何？須繪圖或製模型說明之。	3
	61	門上紋飾如不能將原物獲得時，須繪一草圖或攝影之或用紙拓之。	3
	65	繪一村子之平面草圖，如有住宅　房等等，入口及方向俱須繪明，百分比例亦不可少。	3
	67	如村落有防衛者須精確攝影之，最少須於平面圖將出入口防衛情形繪明。	3
	72	詳細說明園垣並畫其正面（所用之材料、高度及百分比）。	3
三、飲食	86	較大之陶器不易攜帶時，則繪圖說明之（最好橫面剖圖），或攝影之（俱須有百分比），陶器邊及底之破片，俱當拾取之。	4
	92	食果實用何種器具？其各種不同之形狀須搜集之，或繪圖，攝影說明其用法，其名稱亦當詳細記載。	4
	93	手磨，臼之形狀及用法，須繪圖或攝影說明。	4
四、裝飾與髮飾	115	髮飾須特別注意，繪圖或攝影之。	5
五，人工改造身體	133	畫其形像記其名稱並問其意義。	6
	139	詳細繪其圖樣或令紋身者繪之。	6
	152	耳之改變，穿通耳珠抑耳邊？耳飾戴於何處？畫圖說明之。	6
七、武器	213	張弓時弓與箭如何安放，弓係放平、放直，抑放斜箭？係在弓之左抑在右？皆需注意繪圖或攝影說明之。並問土人，瞄準之方法如何？	8
	218	製箭所用之器具及使用方法，附圖說明之。	9
八、狩獵，漁業，畜牧，農業	245	大件之陷阱或機關不能攜帶者當詳細附草圖或照片說明之。	10
	273	各種家畜須攝以照片或繪以彩圖，動物之骷髏能搜集最佳。	11
	292	犁，鏟子，鋤子係鐵抑木製？全部農具當詳細繪圖或攝影之。	11
十一、音樂	361	樂器，攝影其樂器及奏樂者持樂器之特殊狀態，搜集某樂器。	14
十二、交通器具	389	橋及吊橋須研究而攝影之。	15

項目	編號	條目內容	頁碼
	394	船，大船於運轉時既不便，而博物院中地方亦有限，最好令造船者照原舟製一模型，船首船尾船邊裝飾之，能得原物固佳，不然須詳細攝影之，如能繪一平面、縱面及正面船圖更佳。其比例須為一與二十分之比，如船係雙船或有附船及船樓者，當特別留意之。	15
	401	錨，能得原物最好，不然須製一模型，最少亦當攝影之。	15
十四、技術	443	搜集使陶器光滑及加以紋飾之器具，大件不能攜帶之陶器，可繪圖或攝影之，陶器底邊及有紋飾之破片皆饒有興味而有價值者。	17
	444	詳述作型及燃燒之方法，繪一窰之圖形。	17
	473	製船業，說明及繪一船塢，採集製船之所有工具，各種不同之船類，須攝影或繪畫之，船上各部份須附以該地之名稱。	18
	492	畫一鎔鑄爐子之草圖或攝影之。	19
十七、婚姻，婦女地位，小孩	661	搜集舉行此種儀式時所用之裝飾品面具等物，其儀式能用電影機攝影之最佳。	25
十九、宗教，敬神及神話	689	面具之裝束，除採集外，當精細研究並多攝影之。	26
二二、時間計算，天文，歷史	829	史前文化之遺跡，須細心搜集之，其建築則繪圖或攝影之。	31
二三、計數及算數	834	計數時手指姿勢，須詳細說明及連續攝影之。	32

資料來源：《民族調查表格》（凌純聲 1935）　　施博雯整理製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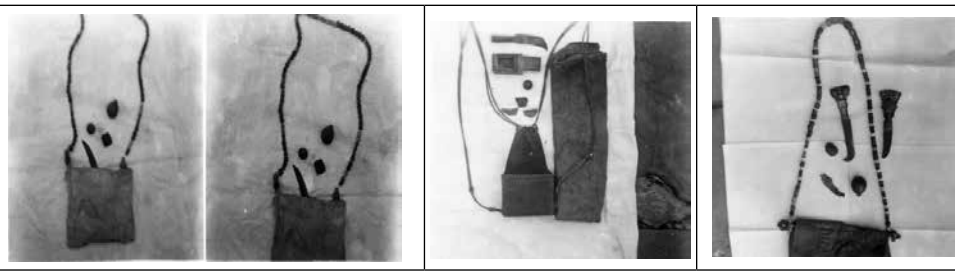
1955年民族所籌備期間第一次集體田野工作，由凌純聲所長帶領李亦園、任先民、李卉和鄭格等人（圖1），一同前往、進駐屏東縣來義村與佳平村排灣族聚落，並就近調查同屬排灣族人住居範圍的萬安村。這一次的調查活動有明確的分工，李亦園負責社會組織相關資料之蒐集，任先民則針對物質文化進行調查，李卉紀錄部落婦女織布過程（圖2）。研究團隊除卻參與觀察以及訪談的實施，亦留心標本之採集（任先民 2012，圖3），以及田野照片的拍攝。這一次實地調查留有180多幅的照片檔案，拍攝內容囊括上述表格所羅列的大部分項目。以《民族調查表格》編號第50條為例：「各種不同之房屋須詳細說明，並附照片尤佳」（凌純聲 1935：2），該次田野於「頭目gealing家房屋」檔案標題下，查詢到八幅連續拍攝「頭目gealing家房屋」正面、後面、側邊、門楣、家屋前石板等照片（圖4）。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3）

圖1　1955年屏東縣來義村，凌純聲（右三）與排灣族頭目Chalas家的Gilegilao（中）、當地族人，以及（左起）李亦園、李卉、任先民合影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3）

圖2　李卉紀錄部落婦女織布過程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3）

圖3　採集之標本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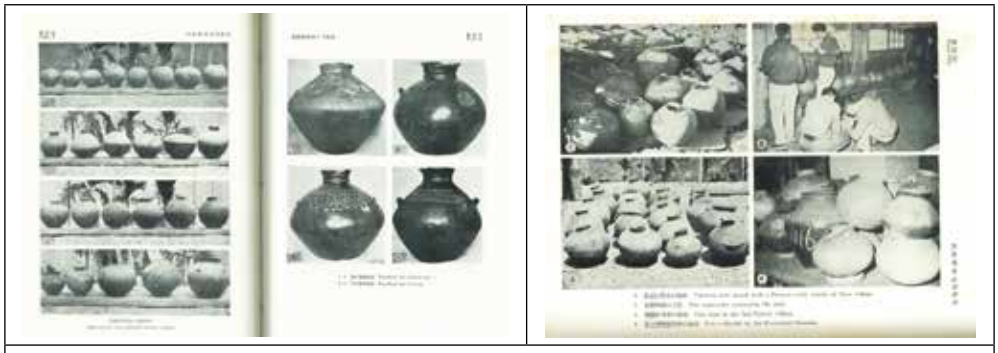
圖4　頭目gealing家房屋

本文作者由中研院民族所「田野照片」數位檔案資料庫，選取了1955年所拍攝、主標題為「頭目gealing家房屋」八幅圖像中的五幅（圖4）。這五幅包括全景、中景的圖像，是由不同角度、距離拍攝而成，符合並成就了照片作為紀錄工具的關鍵及潛能（參考 Collier 2009：17）。[6]八幅圖像中的其中五幅，排列及呈現如上。原本個別「住居」數位空間某處的照片圖像，被移置此處，而有了一些關於家屋訊息及意義產出的可能。這些照片圖像，一方面保存、凝結／紀錄了彼時、該處家屋的物理、表象、形制，以及一些可供辨識的細節，因而有了作為視覺文件（visual documentation）的能力。再一方面，照片圖像提供了關於這一處家屋的諸多面向、可靠且令人信服的攝影證據（photographic evidence）。[7]

6　中研院民族所數位典藏的「田野照片」檔案，有許多由不同角度、距離針對同一對象、物件所拍攝的照片圖像。

7　證據可以理解為，人們看到、經歷、 讀到或被告知的任何東西，亦即使人們相信某事是真實的或確實發生過。

從不同角度、距離對某一對象或物件進行拍攝，經常運用在物質文化譬如陶器的拍攝上。而製陶工作，以及其他物質文化或工藝品的製作，當時研究團隊也多以拍攝連續照片加以紀錄。此些特定主題之連續照片，提供研究人員或後續研究者有了「看得見」的管道可資依循，以此更好地去理解製作的程序過程，並能夠從中探悉各（物質）元素之間的關聯性。以某種序列方式拍攝的這一類照片圖像（圖5），有其潛能為「比較」研究提供基礎，或變化為其他類型學的排列，而這就如同考古學家對陶器所做比較、考據那樣（Collier and Collier 1967），因應不同提問或目的（譬如出版或展演），在不同基準點上重新揀選照片圖像物件、進行排比（圖5），從而產生意義上的新見解。



林文玲翻拍自（任先民 1960）

圖5　因應不同目的選取、排列照片圖像以進行比較

攝影拍照當下，透過照相機的機械運作而製造圖像。這些圖像儲存在膠捲底片上，可供後續個別照片的輸出，或者作為出版品中的圖像資料。此處所謂的「圖像」，指的是我們從所有可用的視覺刺激，亦即我們對現實的看法中劃定的一種思考（或解釋），讓鏡頭前的對象由3D（可見／視性）樣態，轉換成二度空間（可見／視性）編碼（code）（Causey 2017: 27）。由立體到平面，雖然減少了一個向度的空間，攝影圖像依舊「擬真」被拍攝對象（物理特性的特徵），化身為可信賴的視覺文件。這或許是凌純聲依賴攝影機及照片圖像，並將其視為田野調查不可或缺之有效工具的關鍵理由。

強調及時用筆記下實地調查時的田野聽聞，並極為重視田野筆記的完整和詳盡的凌純聲，卻也意識到以文字做筆記的一些侷限。凌純聲雖是用一句話

帶過「攝影的重要不必多說」（凌純聲 2003：10），然而在《民族調查表格》（凌純聲 1935）數個不同條目當中，都可以看到他對攝影如何運用於調查活動，提出清楚指示。凌純聲：「文字記錄需用圖畫記錄來增加他們的真確和明顯的程度」（凌純聲 2003：10），從中透露出凌純聲對視覺／圖像文件所抱持的肯認態度。

（二）田野工作的技藝配備

善用視覺／圖像去構成田野資料文件，亦見諸當時民族所的研究人員。1957年獲美國亞洲基金會的資助，民族所計有鮑克蘭Inez de Beuclair、衛惠林、劉斌雄、林衡立、許世珍、任先民與鄭格七人，前去蘭嶼針對雅美（達悟族）的社會經濟及禮俗習慣進行調查。

> 鮑克蘭女士偶然看到鹿野忠雄（Tadao Kano）與瀨川孝吉（Kokichi Segawa）共同出版的*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 Vol. 1: The Yami* 一書，就親自到蘭嶼去看，回來後很高興的跟凌（純聲）所長說，雅美人就停留在鹿野書裡所描述的時代，幾乎沒有什麼改變。她覺得鹿野忠雄與瀨川孝吉只紀錄了物質文化，而人類學應該從事社會文化的研究。她因而想辦法去申請到一筆研究經費，民族所就以凌純聲所長為核心組成研究團隊。……〔這次調查〕衛惠林負責社會組織，但他因為在臺灣大學兼課，無法離開，因此凌所長邀劉〔斌雄〕先生到民族所擔任助理研究員，那時是1957年4月。劉先生會講日語，可以跟蘭嶼的老人家溝通，就由劉先生擔任衛惠林的助理去蒐集系譜資料。……他（劉斌雄）從來沒學過人類學，根本不知道如何調查系譜，拿著*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卻能無師自通。他在蘭嶼每天訪問，把全島人的系譜都調查清楚，接著開始畫聚落圖。把所有系譜上的每戶人家的住宅都畫出來。（葉春榮 2008：555）

劉斌雄藉由*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51）這份手冊的指引、完成他於該次

實地調查被賦予的任務。[8]《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附錄一」有100頁之多（衛惠林、劉斌雄 1962：169-268），完整刊載了劉斌雄通過田野訪談的實施，進而精心「繪製」而成的「蘭嶼雅美族的系譜」。這些系譜記載著當時代雅美（達悟）族人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網絡，亦即當地之社會結構的重要構成要素及其關係型態。這些工整且條理分明的系譜圖，對多數人而言應過於抽象；然而，在地族人或熟悉這裡的人，若將系譜合併《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章節最前面所提供的島上五個社的平面圖相互參看（同上：vii, xiii, xiv, xvxvi；亦見表「《民族調查表格》中關於攝影、照片或地圖、繪圖之條目」編號30有關於繪製平面圖的條目），透過有著居住布局以及家戶資訊的地形圖，將使得由點、線構成的系譜結構圖，有了立體化的可能，進而對系譜圖所含蘊的社會關係更為實質性意涵的掌握。

對《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兩位作者而言，這一本他們眼中的報告書，「除了一般記述說明以外，儘量把原始的證據事實提供出來。如村落圖、系譜表、漁團名表等，都作為附錄印在前面或後面。讓讀者可以在那裏查校出社會組織的參與關係」（同上引：iv）。換言之，花很多功夫畫出來的這些系譜圖，是田野實地調查，——民族誌的動態過程——，蒐集而來的原始資料。而且這些（系譜圖）原始資料的出現與形成，可以說是劉斌雄在田野實地，一手捧著*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這份田野指導手冊，另一手記下／畫出受訪者提供的各種訊息。顯而易見地，*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這份田野手冊在此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任先民、吳燕和以及石磊也曾在不同場合，揭示了凌純聲對當時身分為學生的他們，在田野訓練與要求上（包括田野攝影、圖像的使用、相機的配備與使用的訓練、圖像的繪製等），皆以*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為本（請見中研院民族學博物館「威權時代的臺灣原住民研究」特展以及「凌純聲先生紀念展」常設展）。[9]

---

8 中研院民族所圖書館藏有1929年（5th ed. 一本），以及1951年（6th ed. 一式四本）兩個版次的*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查對館藏條碼得知，這五冊圖書是民族所籌備時期已經有的圖書。

9 吳燕和回憶他於1964、1965年間針對台東太麻里流域東排灣族進行民族學調查時，「確實帶著一本當時民族學的田野聖經*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依照這個法寶的教條，詢問報導人。……我知道當時的師長前輩也都用這本大綱」（吳燕和 1993：9）。石磊1972年發表於《中央

在田野實地工作期間，一邊進行著調查，一邊翻看*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讓它為自己指點迷津的民族誌工作者不乏其人。奠定民族誌田野工作的典範人物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也經歷了這樣的過程。在Malinowski身後出版的*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有一段內容：

> 我寫著我的日記，並試圖綜合我〔得到的資料跟它〕的結果，複習*Notes and Queries*。[10]為出門做準備。晚餐，在此期間我試圖引導談話、〔好讓對談內容〕圍繞民族學主題。晚餐後與Velavi簡短交談。又讀了幾頁*N* & *Q*、裝好照相機。然後我去了村子；月光下的夜晚很明亮。我不覺得太累，我很享受這次散步。（Malinowski 1967: 30）

正是藉由這本手冊的指引，[11]Malinowski一步一步地推動他在初步蘭島（Trobriand）的初步田野工作，並對其研究對象之社會文化進行了系統性的調查。而後更據此而成就其民族誌經典大作：*The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南海舡人》（1922）。

Malinowski奠基田野實地工作的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研究，是劉斌雄效法的對象。石磊曾經提到1958年暑假，當時他還是臺大考古人類學系三年級的學生，參加了民族所籌備處凌純聲主任舉辦的「馬太鞍阿美族民族學調查」（訓練活動）。該次活動由劉斌雄與溫遂瑩兩位民族所籌備處研究人員，率領三位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學生（石磊、凌曼立與陳清清）前往。石磊與劉斌雄一同住宿在當地一位農民的家裡，石磊回憶道：

> 我們就這樣一塊生活了大約有一個月的時間。他（劉斌雄）告訴我他在蘭嶼田野工作（約一年前的事情）時的趣事與馬林諾夫斯基在初步蘭島田野工作的點點滴滴，並告訴我學人類學的人都應該以馬林諾夫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的〈新社卑南族的親屬制度〉提到，「二次婚型則見*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1972：48，註腳1），在此亦見*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的身影。

10 Malinowski用的是1912年出版的第四次修訂的*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11 Malinowski曾經將*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視為民族誌方法的範本（Ball and Smith 2001: 306）。

斯基的田野工作精神為工作目標。這是〔石磊我〕第一次聽到馬林諾夫斯基的名字與他的參與觀察法。（石磊 2008：542）

Malinowski在*The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南海舡人》開宗明義地向他的讀者表示，他所企圖去達成的是：「對事物作客觀與科學性的觀察」（Malinowski 1922: 6），而這項任務是經由田野工作與民族誌過程而達成。傳統民族誌的田野調查進行一種客觀、中立資料的生產，在如此之資料、知識的產製過程中，基本上實行一定的客體化（objectification）策略。在標榜寫實、真實反映在地人觀點的訴求下，所運用再現田野的具體化模式深深具有視覺證據之意含，亦即「觀察者」的眼見為憑：一種立基在視覺主義（ocularcentrism/visualism）的認識世界方式。而以圖形、圖像（諸如繪圖、系譜圖及攝影等）方式描繪世界的現實，堪稱是一項視覺主義的體現與突出表現。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書頁當中收納了為數不少的照片，雖然「〔這些照片〕僅被視為是促進〔文化〕這項科學志業的輔助物件」（Young 1999: 13）。然而，Malinowski書頁中的照片圖像，有著快門閃現當下，謹慎構圖、力求清晰而不偏不倚的深思熟慮（圖6）。而這些精心謀略的攝影／觀看，是深深含藏著「現場－目睹－現實」的邏輯以及意念在其中。如此這樣的看見，以及由之而來的知識，所欲傳達的是「近乎」攝影機般的「現實」／知識（參考林文玲 200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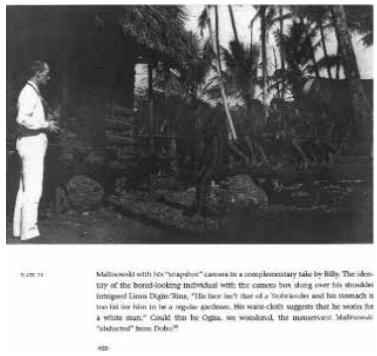


PLATE 11 Malinowski with his "snapshot" camera in a complimentary take by Billy. The identity of the bored-looking individual with the camera box slung over his shoulder intrigued Liam Digim'Rina, "His face isn't that of a 'Boforaindes and his stomach is too fat for him to be a regular gardener. His waist-cloth suggests that he works for a white man." Could this be Ogina, we wondered, the mumeryace Malinowski "inducted" from Dobu?

PLATE 145 In the mortuary distributions of food and wealth, based on the idea that the members of a deceased's sub-clan give payment to the other relatives for their share in the mourning, women play a conspicuous role and conduct some of the ceremonial distributions themselves. Sexual Life, 32

A moment in the first mortuary distribution, called *sigilyawali*, which takes place on the same day or the day after the burial. Kinswomen of the deceased distribute

上圖林文玲翻拍自（Young 1999：52）
右圖林文玲翻拍自（Young 1999：216）

圖6　帶著照相機現身田野現場的Malinowski

照片圖像讓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知識所由來的民族誌動詞狀態：田野過程，所著重的觀察以及隨之而來的描述，透過圖像而具體具形地呈現出來。如果說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是探索文化差異的學科，藉由什麼而能夠更為具體而直接地，將異地「他者／文化」彷如「任意門」般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在更早之前（交通不便、照相攝影機不普及、無電腦及無網路）的年代，或許照片圖像就是那一道任意門。由於照片圖像符應探索文化差異的學科志業，因此很容易被拿來為民族學／文化人類學辯護（Ball and Smith 2001: 305）：夾帶著經驗證據的視覺／圖像文件因此顯得有力道、不必多作解釋。視覺／圖像文件夾帶的證據力，亦適用在以圖形方式描繪被研究對象世界的現實，譬如劉斌雄有憑有據的系譜圖，或者藉由同一主題的連續攝影（並不一定在同一天）對蘭嶼實地調查所進行脈絡連貫的圖像紀錄（請見圖7）。[12]

衛惠林與劉斌雄兩人在《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序言提及報告書所「根據」之物，沒有照片圖像這一個項目。然而，審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的1957年蘭嶼實地調查照片，發現許多圖像與鹿野忠雄（Tadao Kano）和瀨川孝吉（Kokichi Segawa）的*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 ,Vol. 1: The Yami*當中的圖像，在拍照主題、取鏡及角度等有相當的雷同以及神似之處。圖7、圖8的「蓋工作室」照片圖像，一則（圖7）來自中研院民族所「田野照片」數位典藏資料庫，另一（圖8）為鹿野與瀨川兩人書中的圖像。當年看了鹿野忠雄和瀨川孝吉的*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 ,Vol. 1: The Yami*，自行去了一趟蘭嶼的鮑克蘭，回來之後向凌純聲報告她在蘭嶼的見聞與心得：「雅美人就停留在鹿野書裡所描述的時代」。在此，借用鮑克蘭的話，劉斌雄等人紀錄圖像中的雅美人，似乎也「停留在鹿野書裡所描繪的樣子與狀態」。這個現象，一方面指出了照片圖像「寫真」、反映「現實」的能力，再一方面鹿野與瀨川書裡的照片圖像，對於瀏覽過它的人（譬如1957年去到蘭嶼進行調查的民族所研究人員）的觀看視域，或許有著潛移默化的滲透作用。

12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在手冊的附錄，針對靜態攝影以及電影拍攝都提出一些重要原則以及操作方法。

造工作室

堆石頭牆

雕室內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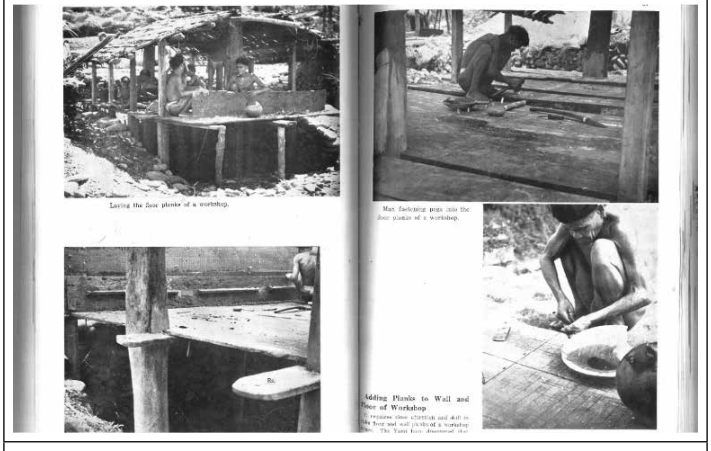
築屋架

雕室內板

堆石頭牆

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3）

圖7　1957年4月台東縣蘭嶼鄉椰油村造工作室系列



林文玲翻拍自（Kano and Segawa 1956: 66-67）

圖8　1930年代蘭嶼達悟族人蓋工作室的情形

（三）小結

紀錄，咸被認為是民族誌田野工作與攝影之間最為關鍵的共通點（Niskač 2011: 125）。實地田野攝影，嚴格來說並非只是機械自動成像的動作過程，實則牽涉拍攝者、圖像與觀眾之間的多重關係。而且，民族誌田野攝影所遵循的方法、規範，關係著何種圖像的產出，並影響後續閱聽眾觀看照片圖像時的感知與接受。因此，我們若反身逆看拍照的經驗歷程，是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去理解

民族誌田野調查的質地與內涵。再者，攝影的紀實、紀錄性及擬真能力，讓它容易被視為是一種科學／學科攝影（scientific photography, die wissenschaftliche Fotografie）。而科學／學科攝影的本質在於，它是一種捕捉現實的媒介／框架（Staveník 2015: 131）。「〔科學／學科攝影的〕每張照片給人的印象與大多數其他科學技術一樣，它展示了被拍攝對象的典型和最具特色的東西」（Becker 1974: 8）。展示被研究對象群體之最具典型和別有特色的東西，對大多數民族誌研究者而言，應是其首要關切以及努力的目標。而這也正是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實地調查當下，通過田野攝影希望達成的任務。

在如同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田野照片歸屬的科學／學科——一種寫實攝影，「寫實」一詞在此指的是一種特定的攝影方法。儘管凌純聲以及當時一同進行實地調查的研究人員，並未特別去說明如何操作田野攝影這一件事，也未將他們在田野當中的照片拍攝及其方法描述為現實（主義）。然而不可諱言，民族誌田野調查與人類學理論是存在著積極的關聯（Howell 2018: 1），並且（任何一種）理論總隱含著（想要）趨近或捕捉之現實及其樣態。反過來說，研究人員所抱持的「現實」概念，實際上牽動、左右著民族誌學者如何著手田野工作調查，並與他如何去紀錄、選擇哪些方法或何種媒介有很強的關聯。這些被仔細考量進而採用的紀錄／方法與媒介，同樣暗示著研究人員對現實的構念及觀想。

總括而言，中研院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的臺灣原住民族實地田野調查對攝影方法的使用、表現出來的特點，類似Allan Sekula（1975）所指認的紀錄攝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紀錄攝影，攝影者以目擊者（witness）自居，攝影行為是透過鏡頭進行實地報導（reportage）。而實地攝影以及它的擬真圖像，是一種立基於並體現著經驗真理論（theories of empirical truth），關注豐富資訊價值（informative value）的現實主義（realism）（Sekula 1975: 41）。在此，拍攝及照片得力於攝影的逼真有力的效果和它的透明度，以此被用來建立人類學事實（fact）的一種積極方式（Edwards 2011: 162），並讓它們成為建立以及勾連客觀方法和各項學科願望的中介位置。此外，儘管照片可能是出色的現實主義者的工具，但證據的有效性實則取決於觀察的質地。這或許是Alfred Cort Haddon敦促通過具備專業能力的觀察者，進行系

統性田野調查，[13]以此才有可能以「學科技藝的眼睛」對特定社會進行「深入」研究（Kuper 1977: 54）。Haddon時期被廣為運用的*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因此不只是旅行者指南，而是植基在力求精確方法的人類學研究，並藉此給予訓練有素（或有待逐漸養成）的實地調查田野觀察者諸多建議、有用提醒的手冊（Ball and Smith 2001: 306）。

1950至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由凌純聲主持、推動的集體實地調查，其田野工作方針、實際操作方式，應多半衍生自《民族調查表格》登載的條目、提示觀察與紀錄之綱要。這之外，*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相當程度則給予當時民族所研究人員，於田野實施與方法上更為實質的指引。另外，流傳於當時代的相關照片圖像，[14]應該也影響著研究人員觀看的視野。而這些田野工作調查一次一次的實施，鍛鑄了民族誌田野的科學／學科性。而調查的同時所拍攝的田野照片，體現著觀察／拍攝者身上所烙印的學科技藝，以及透過照相機而傳達出某種訓練有素的學科專業眼光（skilled vision）（Grasseni 2007: 45; Grimshaw 2001: 53）。

五、合併攝影圖像的人類學知識生產

凌純聲（1934）沿襲蔡元培的看法，區辨了民族誌（ethnography）以及民族學（ethnology）兩者。

> 民族學有紀錄與比較的兩種，偏於紀錄的名為紀錄的民族學，西文大多數作Ethnographie而德文又作beschreibende〔描述性的〕Völkerkunde；偏於比較的西文作Ethnologie而德文又作vergleichende〔比較性的〕 Völkerkunde。（凌純聲 2003：3）

---

13 在Alfred Cort Haddon的領導下，劍橋托雷斯海峽探險（The Cambridge Torres Strait Expedition）被視為英國人類學發展的分水嶺——以實地觀察、與當地人互動交流的方式蒐集資料。而照相機以及電影攝影機在此次探險活動中，對於快速流失的當地住民之社會文化，不只扮演著紀錄的關鍵角色；透過靜態以及動態攝影圖像，一定程度保存、「搶救」了一些「文化」之事物與重要面向。

14 譬如1957年蘭嶼實地調查，參與此項調查的研究人員，特別提到的*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Vol. 1: The Yami*。

凌純聲撰述、出版於1934年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不僅示範了中國第一次的「科學田野調查」，亦成就了中國第一本「科學民族誌」（李亦園1970：2）。《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全書架構體現著整全觀的民族誌描述，其章節涵蓋了赫哲族的歷史背景、物質文化、宗教習俗、傳說神話，以及語言等各個面向。凌純聲通過該書而奠定的科學式民族誌之書寫範式可謂影響深遠，舉凡當時中國邊疆的民族調查，以及二戰之後從事臺灣原住民族研究的民族學從業人員，無不以此書為範本，撰述其調查報告（李亦園 1970：2）。

李亦園將《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與Malinowski出版於1922年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同比擬，認為兩者皆在其學術社群樹立了民族誌研究及書寫之典範，標記了人類學民族誌研究的劃時代意義。李亦園特別強調凌純聲民族學研究的「科學性」，主要因為研究的實施來自實地調查。再者，或許因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這本民族誌的圖版佔了極大篇幅：全書694頁，插圖高達332張，書中的攝影紀錄圖像寓意「眼見為憑」的實徵精神，很能呈現「科學」所標榜的「真實性」。凌純聲於民族所擔任籌備主任及所長期間所出版的《民族學研究所集刊》，保留了這一圖文並呈的民族誌風格；專書專刊甲種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研究主題的民族學專誌，同樣承襲了對圖像資料（無論是繪圖或攝影）的多方運用。

上個小節「四、實地調查的田野紀錄攝影」針對民族誌田野工作（可以將它理解為一種動詞狀態的民族誌）與攝影之間看似平行發展，卻於實地調查執行當中，彼此映照、相互銓釋的互動關係，進行探析。田野拍照經驗有助於我們更好地去理解民族誌田野調查的實質及內涵，以及它於資料形成的階段即隱含的與人類學理論的勾連。而作為比較性的民族學，是脫離田野實地調查活動，進到學術研究、知識生產的另一個階段。在此階段，研究人員多半透過文字為主體的研究論文或專書寫作，將實地調查階段所蒐集的資料，置放到特定主題或文類、理論框架，進行研究成果的產出：一種名詞狀態的民族誌。

1950至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在搶救民族誌思想範式的促動之下（吳燕和1993：7），積極展開針對臺灣原住民九個族群的集體調查活動，蒐集各項社會文化主題的整全性資料，並透過文字、錄音、繪圖或攝影等媒介加以詳盡紀錄。這些田野資料提供研究人員後續論文以及專書著述的扎實基礎。而當時實

地調查同時所拍攝的「田野照片」，無論通過《集刊》的單篇論文或者專書專刊甲種民族學專誌，而有了露臉、現身的機會。這些攝製方法及屬性甚為相近的田野照片，爾後透過一些特定的想法、概念而被綁定、出現在文字書寫的空間與脈絡當中，有了許多集結的現象。為數不少的田野照片圖像被合併進到文字書寫的文本，從而造就這一批攝影圖像社會傳記偏向的重要生命閱歷。

中研院民族所籌備期間的實地調查，研究人員在田野這一專業場域當中執行攝影紀錄工作，時常混和不同角度、距離進行拍照，擷取遠、中或近景、特寫鏡頭之攝影圖像，也有根據鏡頭框架邊緣進行構圖，以及針對某一特定人事物或主題連續圖像的攝取，這些攝影動作在在體現著研究人員訓練有素的（學科／科學）眼光。這些烙印科學／學科紀律，依據特定安排及協議攝取、獲致的田野攝影圖像／資料，紀錄、儲藏著豐富而多元可能的訊息在其中。然而，這些田野攝影圖像如何轉進到文字主導的研究論文或民族學專誌的書寫脈絡當中，發揮研究探索、論述推進或觀點形成的（協作）功能？如同文字媒介一般，照片作為學術著述的資料根據或訊息來源，亦需經歷一番組織化的過程。被收納進入文字書寫介面的攝影圖像，因其物質性（效應）與關係性（延伸），其組織化樣態是有別於文字書寫的組織樣態過程。承前，以下這個小節聚焦1950至1960年代於中研院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的臺灣原住民族專誌，[15]追蹤當時研究人員如何將實地調查而來的「田野照片」，合併、納入文字書寫的文本，以作為民族誌或民族學、人類學知識呈現的一部分。

合併進入研究論文或民族學專誌的1950至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的田野照片，其意義實踐及效應，顯然不同於藏身實體或數位檔案夾當中的照片圖像。由檔案夾抽取出來，轉置、登載至《民族學研究所集刊》或民族學專誌書頁的照片圖像，因其所著附的物質形式（印刷品、紙張及幻燈片等）、媒介框架（譬如單篇論文、整本書、或數位閱讀）有所變化，將處身、座落至有所差異的上下文脈絡，理論取徑，以及攝影圖像活動、進行閱歷的生態環境。這指出照片（檔案）圖像的內容，有著因不同物質形式，歷練形成它的社會傳記和留

15 《集刊》上所發表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論文，以及對於照片圖像運用的討論，將於第六小節「透過機構刊物《民族學研究所集刊》顯影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有所展開。

下它的生命軌跡。物質性與社會傳記密切相關這一觀點也認為，某一照片圖像（作為客體／對象）在其存在的任何一個節點上，都難以從它所在環境抽離出來、「憑空」去理解它；反而需要觀察它在意義、生產、交換和使用的持續過程（或以攝影檔案生態系統加以掌握）當中對它進行理解。換言之，照片圖像作為客體／對象是被捲入並活躍於社會關係之中，而不僅僅是這些過程中的被動實體。譬如印刷品如此的物質形式讓閱聽眾有門路去接近照片的社會傳記。而物質形式或框架去承載、流通照片圖像，則可以去揭示對（某一單幅）圖像的解讀、詮釋可能，並標示著某一被使用為「流行的」圖像，當它被引用到學術討論的脈絡當中，如何轉變為「科學／學科的」圖像（Edwards 2002: 73）。

（一）照片圖像作為民族誌書寫的輔助物件

中研院民族所立基在1950至1960年代的集體實地調查的人類學或民族學研究著述，單篇論文或集體合作的專書寫作，都需要研究人員從數量龐大且格式多元的田野資料，進行整理、編碼、選取、組職，進而系統化地編織進入描述或分析的文字介面及其肌理脈絡。攝影圖像在此也將經歷因應書寫之主題而被選取納入（或捨棄）的命運，被選取的圖像其內容或訊息也可能遭受一定的修整、更動，以符應文本書寫的整體架構、思維理念或理論關注的諸種考量。換言之，攝影圖像經歷著組織化的過程。一般而言，中研院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對於照片的使用，「物質文化」主題的民族學專誌其圖文比例，高於「社會結構」主題的專誌（林文玲 2022：123，亦請參考附錄）。由於「社會結構」的呈述、分析，時常藉由家戶、親屬、世系及社會分層等去剖析、關聯與呈現，照片圖像能夠發揮的功能並不突出，因此比較被用作輔助的物件。然而，在「物質文化」主題的專誌書頁當中，照片圖像卻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去讓田野現場的物件、物質質地、技術、技藝或精細的紋飾等，有機會清楚而擬真地被「登錄」下來。簡言之，民族學專誌的主題、研究對象群體及其社會文化處境，決定著照片圖像登上書頁的頻率、數量多寡，或者擔任主要角色或附屬物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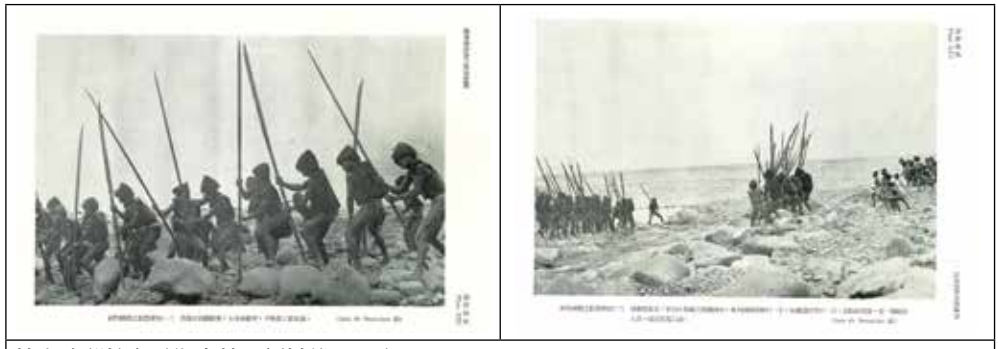
中研院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第一號的《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衛惠林、劉斌雄 1962）兩位作者在序言裡表示，當時為期三個半月的蘭嶼民族學

調查，研究人員針對雅美族人的戶口、系譜、家宅、漁船組織、灌溉系統與土地所有關係，以及社會經濟結構和禮俗習慣等社會文化，進行了全面性的資料蒐集。而後整合調查所獲得的資料，「寫成一部以社會結構為中心的新型民族學專誌」（同上引：iii-iv）。該書圖文之佈局因應社會結構的各個主題分項而加以安排，基本上以中規中矩的方式進行了編排：每一大章節開始之前或章節結束之處，依設定的體例以及出現之頻率，風格相當一致地在章節之前以及之後，都配上與章節主題相關的田野照片，以及措辭嚴謹的圖像說明文字（請見林文玲 2022：127-129）。如此之圖文編排，或許從衛惠林與劉斌雄兩人，在提及、整理日本學者的蘭嶼雅美族研究時，[16]針對鹿野忠雄與瀨川孝吉兩人的*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 Vol. 1: The Yami*的評述，窺見一些端倪：「此書在圖版說明的技術上是遠勝前人的」（衛惠林、劉斌雄 1962：iii）。以此觀之，配有充分說明文字資訊的照片圖像於《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比較用作輔助文字書寫，增益、補充文字指涉之內容。

1957年民族所籌備處所推動的蘭嶼實地調查，前後共有七位研究人員參與；調查所得資料則由衛惠林與劉斌雄將之彙整、寫成《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該書內文167頁加上圖版22頁。22頁圖版共有24幅照片圖像。24幅照片圖像各有標明誰是拍攝者，這是當時出版、由參與調查人員一起撰述的專書專刊甲種當中（請見附錄），唯一一本清楚標註某張照片由哪位研究人員所拍攝。24幅照片圖像當中由Inez de Beauclair拍攝的其中2幅照片圖像，雖說是「演出」的內容，然而攝影的手法、書頁上呈現出來的圖象，是有著文字描述無法企及的效果。這兩幅位於《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最後章節的圖版21以及圖版22，在標題之後的說明文字分別為，「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一）各鬪士頭戴藤兜，上身著藤甲，手持長刀形木棒（Inez de Beauclair 攝）」（衛惠林、劉斌雄 1962：168，圖版21）；「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二）兩敵對社民，在河口對敵之假想陣容，圖左側為攻擊一方，右邊為防禦的一方，其隊

16 日本學者對雅美族的研究上所花費的精力，在某些方面遠比對臺灣本島各族為多，所發表的論文數量也更大。單鹿野忠雄一人所發表過的蘭嶼及雅美研究論文就有四十多篇，不過多屬物質文化及其相關禮儀的研究。雅美族的社會文化結構在這些日本前人的著述當中，沒有被充分研究，一直「還是保藏在未知的雲霧裏」（衛惠林、劉斌雄 1962：iii）。

伍背後，是一羣輔助人員，為之拾集石頭（Inez de Beauclair 攝）」（同上：169，圖版22）。若由攝影圖像觀之，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是由（中）遠景的圖版21，以及（大）遠景的圖版22所構成（請見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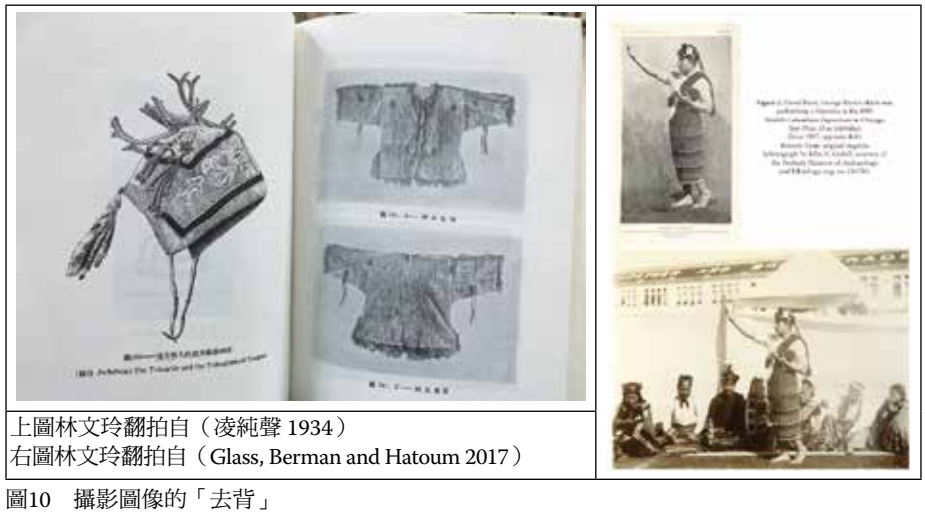


林文玲翻拍自（衛惠林、劉斌雄 1962）

圖9　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

由兩幅圖版標題：「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得知，其圖像內容是當地族人應研究人員的邀請而進行演出。兩幅圖像在《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雖然位於前後頁，然而兩者透過遠近不同景別，相當程度製造了連續鏡頭的場景效果。而照片圖像淡化的背景，使得觀者無法清楚辨識畫面中事物是在何種情境及環境狀態下發生。甚且，照片圖像淡化的背景使得事件發生的環境／所在呈現一種平面化的效果。而這一平面化效果沒有將「意義」給簡化，反而讓前景進行著的事物（確切而言是其輪廓）更為清晰地浮現出來。如此之手法是善用了攝影模擬光線落在實際物體上的物理痕跡的方式作成紀錄，使其體現了光所畫出／銘刻的圖像。換言之，社間械鬪的演出在光沿著人事物的形擴畫著圖像，而這樣之圖像反而讓它從背景剝離開來，有了去背的效果。「去了背」（可能來自於攝影的當下，也可能源自於暗房後製，或者兩者協作而成）的圖像，以剪影之效果凸顯械鬪的衝突及動態，以及器械的剛硬與尖銳。在《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社會結構議題的專書框架之下，原本應屬輔助功能的照片圖像，卻因研究人員對照片的特別處理，加上圖像獨特的物質形跡，（亦即人與物、物質性的互動）使得書頁中兩幅「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照片，有別於該書其他照片圖像而有其突出的表意實踐。

對攝影圖像進行去背處理，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的《圖版》冊當中有相當多的例子（凌純聲 1934，請見圖10上），尤其用在使物質文化物件之輪廓、形制、線條等，在沒有其它元素干擾的情況，從背景脫穎而出、嶄露其清楚而細節的身形樣態。與此相應，Franz Boas（1897年初版，1970年重印）第一部關於Kwakiutl人儀式的*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the Kwakiutl Indians*，是一本納入很多圖像資料的著述：350 頁的出版物總共有266幅圖像資料，[17]其中照片圖版有51幅。該書圖版28標題為Dance of the Hamatsa，看似「草地上的一位舞者」。然而，實際原初照片圖像拍攝的時間地點為1893年芝加哥哥倫布紀念博覽會場的草地上。舞者非獨自一人，而是被其他Kwakiutl人包圍。圍繞舞者的「背景」在*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the Kwakiutl Indians*書頁當中被抹去，造成舞者手勢和用具的視覺重點被凸顯／放大（請見圖10右）。「似乎大多數時候，Boas將照片圖像呈現為圖畫，也就是說，有選擇地保持攝影圖像的明顯、凸出和它的清晰度」（Joseph 2015: 229）。



上圖林文玲翻拍自（凌純聲 1934）
右圖林文玲翻拍自（Glass, Berman and Hatoum 2017）

圖10　攝影圖像的「去背」

不例外地，所有攝影圖像都涉及時間與空間上的選擇和排除。選擇和排除卻不僅僅發生在圖像攝製的階段，通常也出現在圖像成品輸出的過程（大小、

17　這意味著每兩頁就會有至少一幅圖像資料的引用。

裁減、調光、調色、效果等）。既使秉持科學主義範式的人類學知識生產，相信透過科學（方法、媒介，譬如用作紀錄、研究的攝影機）所描述的世界即是現實的世界，然而為達到知識的有效呈現以及傳達的正確性，不乏對「現實」的鏡子：攝影圖像「動手腳」、給予適當科學處理的例子。對攝影圖像所實施的科學處理，產生的諸如對比效果、放大效果（blow-up effect）、揭露效果（show-up effect）等，影響圖像內容（人事物）的變換或重組，有了可見／不可見、現身／不現身、在場／缺席等表意實踐。可見不可見，透過諸如背景之類的細節被抹去，或將它模糊化處理，從而使照片某些部分從背景脫穎而出，成為面目清晰的前景。如此意義效果的產生，在於透過「隱藏與揭示一些事物」的組織手法而獲致（Delaplace 2019: 39）。

前景、背景之間的轉換，比較對應著舞台以及觀眾。另有一些對照片圖像的組織手法，不是作用在前景背景的剝離或切割上，而是關於某一事物的順序及其可理解性，亦即事物本身的邏輯、道理的梳理和呈現上。以1950、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田野照片」中的臺灣原住民族為例，當時他們的社會與文化正急速變遷當中，其傳統工藝技術亦呈現流失的狀態。對此，中研院民族所標舉搶救民族誌（salvage ethnography）的田野工作方針，針對文字描述難以完備的物質文化製作流程，通過攝影機紀錄其製作過程以及工序步驟，顯得理所應然並有其必要。「年老的報導人對於傳統技藝或技術的行將絕滅，感到相當惋惜。因此很樂意與研究人員合作，重演、重現某項技術或技藝，並讓攝影機紀錄其過程，留下製作成品的確切模樣」（林文玲 2022：133）。

（二）照片圖像作為消逝中文化的儲存物件

以搶救民族誌作為田野工作方針與目標，深刻穿透民族所1950至1960年代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

> 從民族所初創到60年代末，凡是在民族所工作過的，沒有不受凌純聲先生影響的。大家都是他的學生。……凡是聽過他那盡快搶救高山族文化材料的呼籲，當然耳熟能詳，不會忘記。凌先生強調盡速調查高山族各部落，而一一做出民族誌的看法，無疑代表當時民族學界的思

> 想範式。……簡言之，高山族的文化，在臺灣光復前，代表傳統土著文化的末期；民族學家的責任，是盡快在傳統文化消逝前，從各族老人的記憶和口中，救出殘存過去的社會結構與宗教習慣的資料。當時的民族誌，一方面是搜集記載一個文化的細節，另一方面則有點像考古學，盡量挖掘描述剛剛入土、或半入土的土著文化遺物，據以「重建」一個跟外來人急劇或大量接觸前的土著文化和社會。（吳燕和 1993：7-8）

1950、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號召的搶救「高山族文化材料」所進行的民族誌調查（民族誌的動詞狀態），可以說是集中火力，動員所方大部分人員，去到原住民族人的村落，全方位地去蒐集、紀錄那些已經或正在消失的傳統／文化。以中研院民族所專刊甲種第二號的《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為例（李亦園等 1962），呼應凌純聲的「搶救高山族文化」，針對傳統物質文化進行探查與搶救，其項目、類別如該專書大章節所標示，有生產方法、生活方式、工藝技術與知識、娛樂與嗜好等較大範疇、方向，每個大章節之下又細分有幾個類目，譬如「工藝技術與知識」之下有紡織、編籃、武器、陶工、木工、以及（通訊、曆法及博物等）知識六個小節。將傳統／文化分成幾個範疇、類目，然後讓研究人員分頭去探查（訪談、觀察與紀錄）部落裡還知道、還記得的族人（通常是老人家）。換言之，搶救民族誌致力於收集、分類與保存「消失著的物件」；反過來，民族誌田野調查工作人員的任務變成了某種「最後機會」的「救援行動」（Clifford 1986b: 112-113）。

搶救行動既使在緊迫的時間壓力之下，田野調查工作最重要任務與原則，在於文化細節的探問、詳盡紀錄；因為詳盡的細節與資料，有助於對某項消失或消逝中的文化，給予更好而完整的重建。擔任《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集體合作撰寫工作召集人的李亦園，於該書第一節即開宗明義地指出搶救「高山族文化材料」的因由及工作目的：「在這數十年中，阿美族文化經過一大變動，尤其最近一二十年來的文化變遷最為顯著（參看〔該書〕第二節論文化變遷一段），所以這一報告的撰寫，一方面是復原過去，一方面又是敘述目前的情況，其意義應是兩重的」（李亦園 1962：4）。檢視《馬太安阿美族的物

質文化》一書，可以觀察到「目前情況的敘述」是透過文字去描繪，「復原過去」的任務則比較是託付給書頁裡為數眾多的照片圖像（有213幅之多）。

以該書第十五節由石磊所整理、撰寫的「陶工」為例，照片圖像與文字所承擔的「復原過去」以及「敘述現在」的使命與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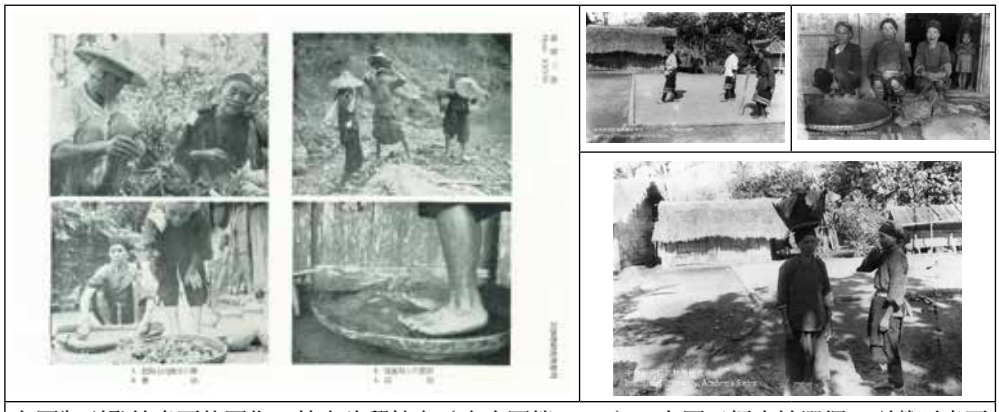
> 阿美族和臺灣本島的其他各土著民族一樣，早已放棄了他們自己的製陶技術，現在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陶器，都完全的仰賴著外人的供給。……為了便於觀察起見，我們還特定請了兩位沒有忘記製陶技術的老年婦女……實地的作製陶示範表演。（石磊 1962：254）

由於當時在馬太安找不到一個會製陶的族人（石磊 1962：254），上述兩位示範製陶的老年婦女實則是太巴塱族人。會有如此現象之原因，在於文化接觸，往往造成同一族群不同地方的族人在文化傳承、變遷上的不同步調與後果。「馬太安阿美族人的社群生活和宗教生活，以及本報告所研究的早期馬太安人的物質生活，目前可以說大部分都已解體或被放棄了，這是一百數十年來外來文化傳入接觸的後果」（李亦園 1962：12）。

《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第十五節「陶工」的部分，有8頁的圖版（每頁四幅照片圖像共32幅，32幅中的4幅請見圖11左），描繪並重建製陶的工序及細節。中研院民族所「田野照片」數位檔案當中，目前同屬馬太安阿美族陶工這一系列的照片圖像有125幅。這意味有將近五分之四的圖像未被選取、登載進入《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民族學專誌當中。沒有被採納的照片圖像其內容至少有兩類，一類譬如從河邊取製作陶器的泥土、徒步返回部落（請見圖11右上），這一類圖像只要揀選其中一兩幅作為代表，並不會因此妨礙人們對過程和連續性的掌握。而另有一類圖像譬如報導人稍作休息、（身形舉止輕鬆地）對著鏡頭（可能正與研究人員閒聊）、[18]畫面出現不相干的人（請見圖11右上）。捨棄此類連續拍攝當中意義重複的圖像或可能旁生枝節的

18　看著鏡頭，標誌著主體：作者和觀看者的存在，並挑戰了人類學家的權威，因為它破壞了田野研究所標榜的即時性，自發性和（對田野情境抱持的）自然主義（假設）（Edwards 2011: 162）。

照片，[19]其用意在於聚焦「重建」製陶這項主題，清除不必要的「雜音」、純化圖像傳送出來的訊息。



左圖為刊登於書頁的圖像，林文玲翻拍自（李亦園等 1962）；右圖三幅未被選擇、刊載至書頁上，林文玲翻拍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數位典藏網（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2013）

圖11　太巴塱族人示範的陶工系列照片

去掉中間休息的畫面，包括對著鏡頭微笑講話的畫面、從屋內「鑽出來」的不相干人等，（效果上將）使得製陶工作有序、精簡、流暢，切合重點地一一展現出來。如此連續性的創造及呈現，取決於圖像的選擇，亦即透過某種隱藏與揭示之間的互動及其效用而來。還有一類夾在製陶照片系列之中，「婦女頭頂物品」、「頂布捲法」等（請見圖11右下），明顯地是族人應要求特地「做給」研究人員看以及拍照之用。這一部分的照片沒有被選擇、納入書頁的照片圖像，卻內建了攝影者與被攝影對象的互動脈絡、交流痕跡，從而閃現、批露著攝影當下被拍攝對象社會文化的某些實況。

在陶工系列照片當中的選取或不選取，有類似上述「社間械鬪演出」的去背處理，亦是一種通過隱藏、揭示手法的相互作用，將圖像訊息給予（重新）編碼，以清楚而正確地傳達研究者的「看見」。而扯動「隱藏與揭示」這條線索、轉頭回看，我們會發現，「隱藏與揭示」實際上與研究者在田野甚或

19　所有證據策略都試圖以不同的方式來控制照片中多出來的意涵（Pinney 1992b: 27），因為模擬兩可的東西及意涵，將造成某種不穩定狀態，這將減損人類學材料之科學與正確性，甚且因此破壞人類學的權威。

分析研究、論文著述等階段，怎麼去看（研究對象之社會文化）有關。研究者的「看」是有所憑藉、有它的意向性以及它的視域框架。在此，研究者與他所（能或要去）見到的研究對象之社會文化，是因應特定時空背景下學科之關懷與任務：搶救文化（實地調查、文化細節的探問、詳盡紀錄、立基於文化細節與資料的視覺／圖像之「重建」），而制約、形成他的「看見」與「看到」。然而，搶救民族誌範式下的「文化」呈現「靜止」，而且每個文化之項目／類別（因田野工作的時間壓迫而資料快速收集的工作模式）有著各自分立的狀況。

經歷搶救民族誌的學術勞動與學科實踐，許多當時原本被預設正走向滅絕的文化，至今看來幾乎沒有消失。當年被訪談、錄音、拍照或錄影的族人以及他的話語、身形或動作，被大量地儲存在各種類型的媒介當中，並相當程度在被紀錄的當下即「保留」、表達了自己以及身上的文化。換句話說，若循線追索這些被紀錄下來的資料，可以看到展示這些文化材料的族人實則開闢了通往未來的道路，而他們在此過程（被調查與記錄）中形成、呈現的獨特生活方式，直至今天仍然存在。這一事實，揭露了搶救民族誌作為學科範式的一種，在掌握、理解文化的動態與變遷，有它的不足之處。從這個角度來看，植基搶救式田野調查資料所構成的文本、錄音或攝影圖像，因此顯得不太像是對文化滅絕的紀錄，反而更像是跨文化交流的「紀錄」檔案／文件。這或許如同Elizabeth Edwards所言，民族誌遭遇總是由兩個「平行的現實」（parallel realities）所構成，亦即觀察者的現實與被觀察者的現實，這兩者經常是不能完全調和，或其中一個還原為另一個（Edwards 2003: 84）。然而，被觀察者的現實（譬如某些1950至1960年代的田野照片圖像）所埋藏通往未來的道路，在今日有可能經由後代族人與照片的接觸，譬如中研院民族所與原住民族人的共作展示活動，而觸發新的現實。而這一現實與多年前被攝製、定格的現實是有所交集、起著化學作用的。

從技術或意識形態的層面而言，「搶救文化」行動並未能「真正地」捕捉某一文化和它的各種細節。對此，James Clifford說：文化很少停下腳步／保持靜止，讓我們為它拍攝肖像照（Clifford 1986a: 10）。事實上，文化反倒總是在進行式的狀態：它們是靈活的而不是固定的，流動的而不是靜態的，偶然的而不是絕對的。總結來說，搶救「高山族文化材料」所進行的民族誌調查，是

在特定的時空背景，研究社群因應研究對象群體的社會文化處境，所啟動的探研活動，這同時指出了民族學／文化人類學所烙印並回應著時代背景而作出的學術實踐。

（三）照片圖像作為文化與人格學說的探針

「南澳泰雅族研究計畫」原是一項集體訓練計畫，後來演變為針對南澳泰雅人的實地調查計畫。調查活動起自1960年7月延續至1963年6月結束。參加訓練與調查工作的人員，除李亦園之外，另有石磊、徐人仁、宋龍生、阮昌銳、吳燕和與楊福發等六位。丘其謙、王崧興兩位亦曾短期參加工作。這項調查從田野實地到上下兩冊《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出版（以下簡稱《南澳的泰雅人》）（李亦園等 1963a，1963b），全程參與並擔任調查計畫推動人，[20]以及專書撰寫主事者的李亦園，說明了該書的主題形成以及章節組織架構。

> 當我們開始田野工作之後，我們便深深體會到，目前南澳泰雅人可以說已經放棄絕大部分固有文化，尤其是遷離原居地的村落更為顯著；因此經過初步調查之後，我們共通的問題便是：繼續追問「長老」們有關過去的掌故，以便復原固有的文化，抑或應該注意目前的情況，並追尋其變遷的踪跡？這是我們面臨的重大難題。經過多次的討論和實際的經驗，我們覺得二者並未能看作是不相容的工作，復原過去故然是研究變遷必需的資料，研究變遷亦未嘗不是瞭解固有文化的途徑；假如我們的目的是瞭解泰雅文化的整體，而不僅是為泰雅固有文化開出一張「雜貨單」，那麼這兩種入手法實是齊下的雙管。因此我們在較後的田野中，便一方面搜集、追問固有的傳統，一方面也注意到現在的變遷。（李亦園 1963：i）

20 「馬太安阿美族民族學調查計畫」實施期間（主要於1958年9月至1960年2月；1960年4月至1961年12月之間有四次補充調查），李亦園因獲得哈佛大學研究院獎學金，1958年夏天赴美深造兩年，「缺席」馬太安阿美族調查計畫。李亦園1960年9月自美返台之後，則全程參與了「南澳泰雅族研究計畫」的實施。

因應研究對象的社會情境，上下兩冊的《南澳的泰雅人》相對於之前以搶救和重建傳統／文化為主要任務的《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而有了一些不一樣的關注以及延伸出來的作法。

> 這個報告（《南澳的泰雅人》）各章節的安排，也許被認為有點特別。我們除去在每一章節之後附有陳述文化變遷的部分外，……我們把社化過程（socialization process）排在第二章，也就是說排在本文的最前面，是因為我們覺得自如何訓練兒童使成為一個泰雅族人（becoming an Atayal）開始，應是引導讀者進入瞭解泰雅文化最好的辦法；我們覺得泰雅人是泰雅文化的創造者，這個文化傳統如何訓練其成員，以便繼續維持這個文化傳統，應是研究和瞭解泰雅人及其文化首先要做的事。這一命題固然是以「文化與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的理論為基礎，但我們並不意欲完全接受culture and personality的各項理論假設。（李亦園 1963：ii）

聚焦「如何成為一個泰雅族人」的《南澳的泰雅人》，它的各個章節亦圍繞此一主題與主軸而一一展開。全書分為九章三十三節，上冊包括第一章至第五章，主要討論社會制度與宗教信仰；下冊則是六至九章，比較是處理物質文化與經濟生活主題。在《南澳的泰雅人》下冊的第九章「結論」最後章節之前的第八章安排有「個人生命史」章節，共包括八節個人傳記。個人生命史這一部分的書寫構思，是一項新的嘗試（這是之前的專書專刊所沒有的），「這一安排，一方面是希望能藉此瞭解泰雅人人格發展過程，一方面也想以每一不同個人的經歷印證其文化的各面及文化變遷的情況」（李亦園 1963：ii）。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文化各個面向以及文化變遷情況之探詢與掌握，是為《南澳的泰雅人》分析與論證演繹的動線與延伸。

承接關注彼時當下文化變遷的主題要旨，《南澳的泰雅人》當中的照片圖像部分亦有它運用之特別考量。相較於藉由大量圖像去紀錄、「定著」即將消失文化的搶救民族誌對於照片的使用（以《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最具代表），《南澳的泰雅人》的照片圖像試圖去捕捉的則是，現時當下、坐落既定物

質與社會環境中微觀的人際互動、由此而來的個人人格養成（線索）、以及顯現出來的文化與變遷的議題。《南澳的泰雅人》的上冊，著重社會制度與宗教信仰，全書有46幅照片圖像，專注物質文化與經濟生活部分的下冊，則包含了58幅（請參考附錄）。《南澳的泰雅人》上下兩冊裡面的照片圖像總共加起來有104幅，這都沒有《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213幅那麼多（請參附錄）。

以《南澳的泰雅人》上下兩冊的核心章節、由吳燕和所撰述的第二章「社化過程（Socialization Process）：泰雅人的養成」作為場域，觀察到第二章所包括的「兒童之社化經過」、「成人生活」、「死亡、喪葬與鬼魂觀念」、「社化過程的變遷」四個小節，共有74頁之多、占全書近24%的篇幅，32幅照片圖像（上冊共46幅）有近70%的照片屬於「社化過程」章節所有（吳燕和 1963：51-114）。「社化過程」這一章可以說是《南澳的泰雅人》的核心章節，而「如何訓練兒童使成為一個泰雅族人（becoming an Atayal）」則是「社化過程」該章節承擔的主要任務（李亦園 1963：ii）。圖12擷取自「社化過程」這一章所刊載的幾幅照片圖像。圖12左邊最上方的兩幅圖（出現在同一頁面）的圖說分別是「母親用藤筐背帶小孩上山去」以及「小女孩學習大人洗衣服」。[21]前述兩幅圖下方的四幅圖（出現在同一頁面），圖說依序為「小孩跟著大人到山田去」、「晨起洗衣，公共水龍頭成為主婦們聚會之地」、「小孩比賽玩陀螺」。左邊圖說則有「小孩觀看大人蓋房子」、「出獵前，老人向青年示範武器的使用」、「兄姊背著弟妹，觀看大人工作（右端老人為看顧小孩的祖父）」、[22]「大人集會，小孩也跟著去」、「小孩喜歡湊熱鬧」、「星期日、大人領著兒女去做禮拜」、「喪禮行列與埋下棺材」、「新式的婚禮，牧師向新人祝福」、「婚禮仍不忘舊俗，殺豬分肉給親戚」等。

21 圖說似乎呼應著「社化」（socialization）意涵，「社會要使其成員遵守其道德典範，必須從嬰兒開始（有時未出生就開始了）就逐步加以訓練，使之能成為社會正常的一員」（李亦園 1966：24）。

22 意涵著，社會或文化是行為的產物且因「人」而傳遞下去的（李亦園 1966：1）。

林文玲翻拍自（李亦園等 1963a）

圖12　《南澳的泰雅人》第二章「社化過程」當中的照片圖像

舉出圖12幾幅照片圖像以及它們的圖說，用以指出個別照片圖像，分別符合、應答著「兒童之社化過程」（第五節）、「成人生活」（第六節）、「死亡、喪葬與鬼魂觀念」（第七節）、「社化過程的變遷」（第八節）等所涵蓋的現象。如此章節的規劃，可以看到當時以美國為主的文化與人格、文化與行為相關研究的影響。譬如研究兒童養育方法與人格之間的關係，首先將它們「分析為行為單位（母親如何帶小孩、兒童遊戲等），以當作變項而求其因果關係」（李亦園 1966：20）。《南澳的泰雅人》「社化過程」書頁上的照片圖

像，同時著重的是社會的互動與交流，圖像亦多呈現行走、匯聚（meeting）、行動中事件、遊戲等較為動態的內容。從這些照片圖像的選擇以及附加的圖像說明，觀察到明顯有文化與人格學派的分析方式、論點／樣子在其中。

文化與人格學派的論點／樣子，若從照片圖像的角度去尋索，可能不得不提Gregory Bateson與Margaret Mead出版於1942年的*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這本書。[23]Bateson與Mead在*Balinese Character*裡面提到，兩人攜手進行巴里島田野之前，就已計畫用文字、靜態照片與動態影片的結合，進行巴里島人的研究。這項研究的田野實施自1936年3月至1938年3月，1939年的2月及3月又進行了六周的田野回訪、資料補充工作，Bateson與Mead拍了近兩萬五千張的照片，以及約兩萬多英尺的16mm影片。*Balinese Character*書中有759張照片，共一百個版面，每一個版面有前後兩頁（雙面列印的概念），一頁放4到13張照片不等；描述照片內容的說明，採取一種嚴謹的文字表述方式，並一律涇渭分明地呈現在對頁。Mead透過文字說明，提供讀者準確地去理解照片圖像之內容或人事物所在的脈絡。[24]*Balinese Character*書裡照片圖像的編排有兩種方式。一是圍繞特定的理論假設，將不同場合攝製而來的照片圖像並陳，一種同時性方式遂行比較之用（請見圖13中間圖像）。另一種則是將同一場景、人物、動作的連續照片（請見圖13右邊圖像），依照時間序列呈現出來，並借助文字說明引導讀者關注圖像當中之行為、動作和互動的細微之處（請見圖13中間圖像及右邊圖像）。

總括而言，*Balinese Character*透過精挑細選出來的照片，然後依照同時性或序列排列方式，將照片圖像給予組織、進行排版，以此凸顯個體以及人際互動的微觀層面，以及夾帶的訊息。藉由前述各種作法，Bateson與Mead在將照片作為鏡頭前「現實」的載體之外，亦讓照片圖像同時承擔分析的功能，以此方法實現兩人所倡議的：圖像作為發掘（事實），以及檢驗假設的有力工具（Ball and Smith 2001: 308）。相對於Bateson與Mead訂定規則並有系統的將圖

23 中研院民族所圖書館藏有*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一書，是民族所籌備時期已經有的圖書。查對館藏條碼得知，該冊書的收藏早於上下兩冊的《南澳的泰雅人》。

24 例如圖13右圖最下男孩騎坐水牛背上的圖說：「在溪中洗刷之後，男孩將他的水牛牽回家。看護牲畜是巴里島男孩的重要責任」（Bateson and Mead 1942: 60）。

文合併使用，並以照片為主去構成一本圖文書，《南澳的泰雅人》第二章「社化過程」的文字與照片圖像的運用與佈局，有著類似當時其他專書專刊的編排方式，亦即文字為主體，照片圖像比較是輔助的角色。然而，仔細比對該章節所收納的照片圖像，則清楚接收到作者群對於照片圖像的選擇、編排以及圖說，特別著重較微觀的人際互動，社會、物質環境與生活對個人人格養成的影響，並從個人生命歷程的不同階段，去尋索這些影響發生的樣態。在此，可以觀察到《南澳的泰雅人》第二章「社化過程」的照片圖像，在提供人際互動之現象與動態之（內容）外，並承載著藉由圖像去敘說、進行剖析的明顯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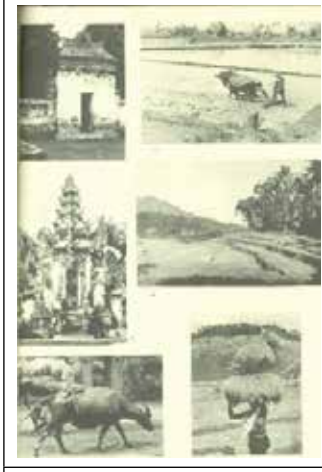


Plate 3 communities with irrigation

Plate 45 the child as a god

Plate 78 small girl's play

圖13　林文玲翻拍自（Bateson and Mead 1942）

（四）小結

上述幾個小節聚焦幾本1950至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的臺灣原住民族專誌，追蹤當時研究人員如何將「田野照片」，因應主題、理論、方法取徑，以及研究對象的社會文化處境，合併、納入文字書寫的文本，而有的多元樣貌的研究成果之產出：一種名詞狀態的民族誌。在這幾本專書專刊當中，觀察到凌純聲、衛惠林、劉斌雄、李亦園以及吳燕和、石磊等人在專書構成，編排、出版或章節撰述，各司其職、有各自承擔的任務以及扮演的角色。而經由研究人員揀選並將之合併進入不同專書主題、內容框架以及論說偏向

的照片圖像，則展現了照片圖像作為科學紀錄之工具媒介，研究資料之儲存載體，或者承擔分析之功能、發揮照片圖像的呈述／再現的技藝。照片圖像的這些特徵與能力，如同Christopher Pinney所說，攝影的「量化與現實佔有能力完全符合人類學的現實主義與量化願望」（Pinney 1990: 260）。

檢視民族誌研究與攝影的關係，讓我們有一些途徑去瞭解攝影的機械手段、收集的物質證據、夾帶的擬真光學效應，如何為更高的科學目標與民族誌準確性提供服務（Griffiths 2002: 87）。此外，照片圖像的視覺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 of visuality），它的物質形跡遞送出來的證據、產生的效應，與民族誌的構成與刻寫之間是有著豐富而複雜的互動關聯和意義實踐。而每種民族誌的構成、書寫與展現的知識與方法，都程度不一地與特定「真實效果」產生關聯。照片與攝影因此含藏著人類學學術關注的重要密碼在其中。照片和攝影與文字書寫、論述的互動同時也是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援用之理論、方法之棱鏡。總結而言，上述幾本1950至1960年代立基在中研院民族所籌備期間的實地調查工作而寫成的學術論著，在廣為結合田野照片、並多方嘗試圖像的能力與效用的同時，意圖建立的即是民族學研究與書寫之科學典範（何翠萍、蔣斌 2014：15；何翠萍 2019：12）。

六、透過機構刊物《民族學研究所集刊》顯影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

攝影以光來畫圖像，用於科學目的的攝影圖像因其光影、明暗，經由去背／淡化背景，或不同景框之圖像的重新組織或排列而形成。這些被組織化的圖像，分別進到《集刊》或民族學專誌兩種類似卻有所差別的生態系統當中，首先因圖像擬真的能力，夾帶的訊息，有著蓄勢待發的意義可能。其次，圖像所憑藉的技術／框架（攝影機的位置、角色……），結合拍攝者對被拍攝對象及其文化可見性所抱持的視覺理論之設框，造就的視覺修辭及語彙，影響意義的生發之向度偏移及接收可能。另外，座落於哪樣類型的書寫文本之環境，譬如單篇論文或整本書，其各自隱含的框架與規格，影響著圖像之篩選、編輯和詮釋。具體而言，合併、納入文字文本書頁的攝影圖像其大小、位置、標題、圖文、單幅

或多幅、序列連續或對比等，提供讀者認知形成以及意義掌握的門徑。

「所有意義都是經由中介而來，意義甚且是在被接收之前，就已通過書籍、電視、報紙和其他溝通形式的編輯與詮釋篩選」（Brooker 2003：240）。擴充而言，單篇或整本書有其各自特定的文本框架，隱含／衍伸的書寫格式，以及將通過相應而來的編輯和詮釋篩選機制。換言之，論文是一種框架、書籍亦是一種框架。當然，1950至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集刊》或民族學專誌，同樣是在一定的框架當中，生產、呈現其文字主導的研究著述／文本。而這些「框架」（們）不可諱言地，亦是著附、坐落於學科內外的時空脈絡及其特定環境、氛圍之更大尺度的框架當中。

《集刊》照片的使用大都集中於該篇文章最後，以並排方式安置於同一頁面。而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的田野照片使用，相較於《集刊》在篇幅、空間、圖片安排及數量上有更大的彈性以及發揮的空間（林文玲 2022：123）。《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衛惠林、劉斌雄 1962）最後章節的圖版21「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一）」（Inez de Beauclair 攝；衛惠林、劉斌雄 1962：168）以及圖版22「社間械鬪之假設陣容（二）」（Inez de Beauclair 攝；同上：169）兩幅圖像以整頁大小予以呈現（請見圖9）。Inez de Beauclair 鮑克蘭（1957）發表在《集刊》第三期的“Field Notes on Lan Yü (Botel Tobago)”一文，或許為容納更多照片圖像，採取一頁兩幅、上下排列的方式加以呈現（請見圖14右）。

專書專刊與《集刊》論文對於照片圖像的運用，除了圖像大小不同之外，《集刊》照片的使用，因應論文著重的分析以及比較，照片圖像其功能，傾向於呼應、旁襯文字書寫之主題或論點之鋪展。而民族學專書則有不少照片圖像是用來傳達環境、氛圍有形、可見、可觸及之樣態，或者補充、完備文字書寫所希望傳達卻可能未竟其功的細節，或關於過程、連續動作之描繪或敘說。然而，同一文類的個別作者對於照片使用、如何與文字文本互動是有所差異的。以Inez de Beauclair 鮑克蘭（1957）“Field Notes on Lan Yü (Botel Tobago)”中的照片使用為例，該文運用有十幅照片圖像，其中兩幅在李亦園〈Anito的社會功能：雅美族靈魂信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1960）一文當中，以相似的大小、一樣的排列方式被引用、刊載。

圖14　林文玲翻拍自（de Beauclair 1957）

李亦園與Inez de Beauclair兩位作者雖然用了兩幅同樣照片，Inez de Beauclair的十幅照片圖像，來自作者自身田野調查的攝影實施，被運用至該文本中的照片圖像，有人物個人、多人一起、事件、地點等圖像內容。這些圖像不僅與內文高度呼應，圖像與圖像之間也因排列順序，不同構圖畫面的混和使用，搭配圖說文字，而讓圖像與圖像之間呈現有機而相互應答的關係互動。此外，de Beauclair的文章屬田野紀要文類，呈現「紀要」的同時，田野人物直視鏡頭的照片圖像，拉近讀者與此遙遠「異地」的距離，消解一些陌生感（請見圖14右）。如此之圖像，即使我們並不具備與被拍攝對象同時空的條件，也仍然可以與照片裡的那個世界發生關係——觀看與被看。換言之，de Beauclair在其文章引用照片圖像之方式，凸顯了攝影所保留了某種非快門當下凝結的「新」的在場，甚且此在場保留了肉身，肉身的厚度使距離產生，如此走向了立體的感知空間、氛圍，而不僅是平面的世界。如此之「在場」經歷轉載至出版之書頁面依然顯現其跡痕。在此，攝影的框與研究論文的框，彼此之間產生了微妙的互動，實現了某種程度田野遭遇之具身體現以及具地體現。[25]

25　鮑克蘭的田野攝影及風格，從Erika Kaneko追思鮑克蘭的一段話，或可尋得一些線索：「她（鮑克蘭）以她那一代更富麗堂皇的風格進行田野調查，但無論我在臺灣少數民族中追查她的足跡，她都受到高度評價。老人們覺得和她說話很容易，也很感動，在她這個年紀，她並沒有迴避拜訪他們和向他們學習的努力。悄悄地，她似乎為他們和一些中國學生做了很多好事。有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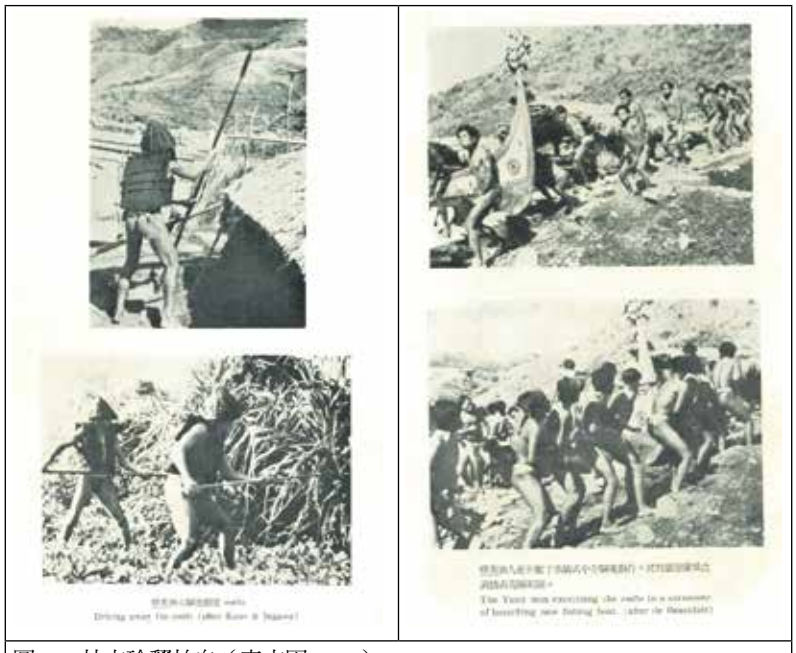


圖15　林文玲翻拍自（李亦園 1960）

在〈Anito的社會功能：雅美族靈魂信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一文，刊載的四張照片圖像的另兩幅（請見圖15），是引自鹿野忠雄與瀨川孝吉（1956）*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 Vol. 1: The Yami* 一書中的照片圖像。李亦園自述道，他並未參與1957年夏天中研院民族所舉行的蘭嶼雅美族調查活動。〈Anito的社會功能：雅美族靈魂信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研究資料，多半根據民族所同仁發表的材料，以及當時來到民族所停留數日雅美族人的口頭報導（李亦園 1960：41）。因此，該文使用的照片亦出自其他曾經至蘭嶼進行實地調查學者之手。四幅照片來自兩個攝影脈絡及其研究旨趣，它們的集結通過李亦園的文字而綁定在一起，並借助說明文字強化作者欲傳達的訊息。進一步而言，〈Anito的社會功能：雅美族靈魂信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的照片圖像，相當程度從圖像產出的人（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環境及其脈絡肌理當中被孤立出來，這使得照片圖像的邊界／框架被剝除、繼而溶解在主述文字主導的勢力當中。

同道合的學者陪伴，她最開心，她會與他們進行熱烈而激動人心的討論。她的興趣廣泛，也反映在她的參考書目中，真是令人驚嘆，她的信件遍及全球」（Kaneko 1981: 93）。

此外，《集刊》論文或專書專刊有所差異的照片使用，不僅表現在圖像於書頁中的大小、位置，也將隨著文類、寫作格式以及主題旨趣而對照片有不同的取用。凌曼立（1960）關於樹皮布文化的學術論著，有發表於集刊的〈臺灣與環太平洋的樹皮布文化〉（有43幅照片圖像，是1-20《期刊》僅次於凌純聲〈臺灣土著的宗廟與社稷〉的67幅），以及收錄於專書專刊甲種第二號的《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第七節「衣服」關於樹皮布的段落（凌曼立 1962）。〈臺灣與環太平洋的樹皮布文化〉一文從比較的觀點進行論述，照片圖像在如此之文類及題旨所形成的框架，有機會從製作、成品、穿戴各個面向，呈現環太平洋區域樹皮文化相似或不同的地方。與此相對，《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第七節的「衣服」，從衣服的原料、衣服的沿革、衣服的種類，依序給予詳細描述，進而彰顯民族誌的任務及特色。在民族誌文本／框架，以樹皮布製作為例，作者儘量放置足夠的照片圖像以呈現這項物質文化的製作流程、工作樣態以及成品等。

此外，照片圖像的敘說與閱讀者的互動，能夠經由書頁的被翻動，而進到另一處場域。翻頁的動作，同時穿越這面照片－鏡子，也彷如跨過某種無形界域，到達另一章節的主題、內容以及情境、狀態。翻頁讓照片由二度空間的平面書頁，在翻動的霎時湧現一種三度空間的場域感。翻動書頁也讓連續性扣連著意義，縫補了事件的動作意涵以及它的時空連貫性。能夠有如此的閱讀效果，不只因為論文撰述者或編輯人員對圖像進行的編排與佈署，這還繫於照片圖像自我發聲的能耐及特別屬性。換言之，中研院民族所1950、1960年代期間於實地調查同時所攝製的紀錄／科學性照片圖像，看似被動的證據之物、卻在被轉載至書寫文本之脈絡，通過其物質痕跡，而觸發一些預期之外敘說（事物）的可能。

而所謂的轉載、刊登，亦可理解為照片圖像移動、穿梭於不同框架，進到專書專刊或《集刊》版面之特定生態系統當中。不過，照片圖像敘說事物的潛力能否發揮，相當程度繫於編輯（人員）對書頁版面之安排、佈署。民族所專書專刊沒有標明編輯為何人，而作為該機構學術表現指標性刊物的《集刊》，在刊物底頁載明它的編輯者：「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編輯委員會」。以《集刊》第20期為例，編輯委員由凌純聲（主編）（自第1期開始擔任）、衛惠林（自第

1期開始擔任）、黃文山（自第1期開始擔任）、何聯奎（自第3期開始擔任）、張光直、李亦園（秘書）、文崇一（常務）等人所組成。[26]編輯委員透過編輯委員會議的每次運作，討論、擬定、調整《集刊》的內容、形式與風格，並對照片圖像進行選擇及編排之各項考慮。[27]運作近半個世紀的《集刊》（1956年春季至2000年秋季，共出刊90期），它的第一個十年（1956年春季至1965年秋季共20期），奠定並顯影了中研院民族所創所初期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

七、結語

作為中研院民族所籌備主任以及創所所長的凌純聲，對於民族學、民族誌研究以及實地調查工作的科學／學科性追索，穿透民族所第一個十年的學術工作與活動，並具體呈現在以臺灣原住民族為主題的專書專刊以及《集刊》中的研究論文。對於凌純聲秉持的科學／學科性，李亦園從兩個學術脈絡給予掌握。脈絡之一是五四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知識界所追求的「科學」與「民俗學」的風潮。當時知識分子希冀藉由「科學」去追趕西方文明；而「民俗學」的探究則在於建構中國國族主義所需的文化根基。脈絡之二則是將文獻考究為主的民族研究，轉為實地考查以及文物標本的蒐集，從中獲得研究材料（李亦園 1970：2）。此外，李亦園也注意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凌純聲 1934）作為中國民族學研究史上的第一本「科學民族誌」，運用了包括繪畫與照片大量圖像資料（李亦園 1970：2）。照片圖像，在使得赫哲族「文化」變得可見的同時，攝影（圖像）擬真、映照現實／世界的能力，強化、增益該民族誌的科學／學科性（修辭）。

本文呼應李亦園對於凌純聲秉持的科學／學科性態度以及落實為研究的理解及剖析，特別著重民族所自籌備到創所初期，在其實地調查當下對照相攝影的倚重，以及後續研究成果出版多方採納照片圖像，從中遞送的人類學

26 《集刊》第13期開始設有助理編輯，第20期的助理編輯為阮昌銳及吳燕和兩位。

27 編輯工作由許多編輯時刻（editorial moments）所組成，學術期刊編輯（主編、編輯委員）時常需針對投稿文章如何組織材料、構建其結果、取用的理論框架、論述鋪陳，進行把關並因應期刊定位、目標及風格，以及設定的讀者群等，進行一連串的選擇與（再）確認（Moeran 2016）。

議題思辨、概念探討以及理論之鋪展，進行梳理。對於照片圖像的使用，可以看到照片紀錄圖像經過程度不一的組織化過程，進而轉載到文字為主的描述與分析論述的脈絡當中。研究人員、論文撰述者、編輯團隊對於照片圖像的組織化工作，考慮的重點在於如何得出正確、適當、有一定情境脈絡的照片圖像，以便與帶著科學／學科技藝的文化書寫協力共作，讓「他者／文化」顯現其形體、樣態（民族誌名詞狀態）。而研究資料所由來的實地調查（民族誌動詞狀態），攝影機從不同角度、景框或事件、動作給予連續攝影，以求紀錄的完整與詳盡。如此之田野攝影植基、內含了經驗的可靠性以及程序的正確性（Daston and Galison 1992: 82），從而創造了人類學現實主義的知識權威（Edwards 2011: 161）。

社會文化人類學／民族學學科無論經歷何種論述潮流、理論思辨之起伏、流變，因其強調的面對面交流、田野實地觀察方法，使其學科身分、界線及特徵仍然是一個與可視性、看的實踐工程高度相關的學術志業。因此，藉由對1950至1960年代中研院民族所「田野照片」檔案社會傳記的梳理，檢視這些攝影（圖像）在何種意圖的驅動之下而被創建，為了哪些目的而被產出，由誰拍攝，以及當時研究人員如何將它們合併、運用到不同行文脈絡之中、發展其研究想法或完備其論述主張，並且在什麼樣的框架／媒介當中集結而成為檔案。對於這批「田野照片」社會傳記偏向的梳理，本文意圖去講述的不僅是民族誌攝影與「田野照片」作為客體／對象如何被捲入並活躍於社會關係之中，還在於透過它（們）、將它（們）帶入分析的中心，使學術活動及其發展歷程有了一種可視化，進而去顯影（稍微有別於文字中心與論述的）中研院民族所草創期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

參考書目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編

1976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概況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013 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網 [Digital Collection Network, Academia Sinica]。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https://ascdc.sinica.edu.tw/single_project_page. jsp?projectId=97，2021年7月10日 [June 10, 2021]。

石 磊

1962 陶工 [Pottery] 刊於[In]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Vataan Ami: A Report on the Material Life of a Taiwan Native Tribe]，頁253-290 [pp. 253-29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72 新社卑南族的親屬制度 [Kinship System of the Puyuma]。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34: 23-83。

2008 以幾段記憶懷念劉斌雄先生 [Remembering Mr. Liu, Pin-hsiung with a few Memories]。刊於[In]劉斌雄先生紀念論文集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Liu Pin Hsiung]，林美容、郭佩宜、黃智慧主編 [Lin, Mei-rong, Guo, Pei-yi, Huang, Chih-huei, eds]，頁541-546 [pp. 541-546]。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任先民

1960 臺灣排灣族的古陶壺 [Ancient Precious Pottery of the Paiwan]。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9: 163-224。

2012 中央研究院與我的臺灣原住民研究 [Academia Sinica and My Study on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發現（史前館電子報）[Discovery (digital newsletter of National Museum of Prehistory)] 第236期 [No. 236]。網路資源 [Electronic document]，https://beta.nmp.gov.tw/enews/no236/page_01.html?fbclid=IwAR2x4dfG3htEpudoL8G9D9Euf6oDeqqsAsrg14a8TCoMNqJrI9liim26vcQ。2020年3月17日 [March 17, 2020]。

何翠萍

2019 相認：記第一次共作展示案 [Recognition: Remember the First Collaborative Display Case]。刊於[In] 共作：記「她方的記憶」—泰雅老物件的部落展示 [Collaboration: Remembrance of “Her Side’s Memory”-Tribal Display of Atayal Old Things]，何翠萍、尤瑪・達陸主編 [Ho, Ts’ui-p’ing and Yuma Taru, eds.]，頁10-39 [pp. 10-39]。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何翠萍、蔣 斌

2014 展示一段人類學的歷史 [Demonstrating a History of Anthropology]。人類學視界 [Anthropology Vision] 16: 14-19。

吳燕和

1963 社化過程 [Socialization Process]。刊於[In]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調查與研究 [The Atayal of Nan-ao: An Ethnological Study]，李亦園等著 [Li,

Yih-yuan, et al.]。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五號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y series A, No.5]，頁51-114 [pp. 51-114]。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3 台東太麻里溪流域的東排灣人 [The Paiwan People Along the Taimali River, Taitung, Taiwan]。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 [Field Materials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7: 18-402。

李亦園

1956 來義鄉排灣族中箕模人的探究 [A Study on the People of Tcimo in the Western Paiwan Tribe]。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 55-83。

1960 Anito的社會功能：雅美族靈魂信仰的社會心理學研究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Anito: A Study of the Malevolent Spirits of the Yami]。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0: 41-55。

1962 總說 [Introduction] 刊於[In]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Vataan Ami: A Report on the Material Life of a Taiwan Native Tribe]。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二號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y series A, No.2]，頁1-14 [pp. 1-14]。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63 序 [Preface] 刊於[In]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調查與研究 [The Atayal of Nan-ao: An Ethnological Study]，李亦園等著 [Li, Yih-yuan, et al.]。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五號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y series A, No.5]，頁i-ii [pp. i-ii]。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66 文化與行為 [Culture and Behavior]。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pei: The Commerical Press]。

1970 凌純聲先生對中國民族學之貢獻 [Professor Ling, Shun-sheng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Ethnology]。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29: 1-10。

李亦園等

1962 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Vataan Ami: A Report on the Material Life of a Taiwan Native Tribe]。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二號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y series A, No.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63a 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上冊 [The Atayal of Nan-ao: An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ume I]。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

種第五號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y series A, No.5]。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1963b 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下冊 [The Atayal of Nan-ao: An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 Volume II]。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六號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y series A, No.6]。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林文玲

2002 視覺性與人類學知識的條件 [Visuality and the Conditions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考古人類學刊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59:4-41。

2013 製作「原住民」：轉換中的技術載體，轉化中的文化身分 [Manufacturing Indigeneity: Technical Carriers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ransition]。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11(1): 155-187。

2022 持續延展的生命傳記：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50至1960年代臺灣原住民族的「田野照片」[An Ever-Extending Biography: “Field Photos” of th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60s in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臺灣人類學刊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20(1): 115-166。

凌純聲

1934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The Goldi Tribe On The Lower Sungari River]。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十四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 series A , No.14]。南京：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Nanjing: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35 民族調查表格 [Ethnic Survey Form]。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2003 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 [Ethnological Fieldwork Methods]。刊於[In]20世紀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方法與方法論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Methodology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of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頁1-42 [pp. 1-42]。北京：民族出版社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凌曼立

1960 臺灣與環太平洋的樹皮布文化 [Bark-cloth in Taiwan and the Circum-Pacific Areas]。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9: 313-360。

1962 衣服 [Clothing]。刊於[In]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of the Vataan Ami: A Report on the Material Life of a Taiwan Native Tribe]，李亦園等著 [Li, Yih-yuan, et al.]。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二號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y series A, No.2]，頁97-130 [pp. 97-130]。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陳其斌

2008 人類學的中國大師 [Chinese Masters of the Anthropology]。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葉春榮

2008 敦厚的長者：懷念劉斌雄老師 [Honest Elders: Missing Teacher Liu, Pin-hsiung]。刊於[In]劉斌雄先生紀念論文集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Liu, Pin-hsiung]，林美容、郭佩宜、黃智慧主編 [Lin, Mei-rong, Guo, Pei-yi, Huang, Chih-huei, eds]，頁553-564 [pp. 553-564]。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衛惠林、劉斌雄

1962 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Yami Botel Tobago]。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甲種第一號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Monography series A, No.1]。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Brooker, Peter 布魯克

2003 文化理論詞彙 [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 2E]，王志弘、李根芳譯 [Wang, Jhih-hong and Li, Gen-fang, trans.]。臺北：巨流出版社 [Taipei: Chuliu Publisher]。

de Beauclair, Inez 鮑克蘭

1957 Field Notes on Lan Yü (Botel Tobago).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3: 101-116.

Ball, Mike and Greg Smith

2001 Technologies of Realism? Ethnographic Uses of Photography and Film. *In* Handbook of Ethnography. Paul Atkinson, Amanda Coffey, Sara Delamont, John Lofland and Lyn Lofland, eds. Pp. 302-319. Los Angeles et al.: Sage Publications.

Bateson, Gregory and Margaret Mead

1942 Balinese Character: A Photographic Analysis. New York: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Becker, Howard S.

1974 Photography and Sociology. Studies in Visual Communication 1(1): 3-26.

Boas, Franz

1970 [1897]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the Kwakiutl Indians. New York: Johnson Reprint Corp.

Caraffa, Costanza

2019 Objects of Value: Challenging Conventional Hierarchies in the Photo Archive. *In* Photo-Objects: On the Materiality of Photographs and Photo Archive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Julia Bärnighausen, Costanza Caraffa, Stefanie Klamm, Franka Schneider, and Petra Wodtke, eds. Pp. 11-32. Berlin: Max-Planck-Gesellschaft.

Causey, Andrew

2017 Draw to See: Drawing as an Ethnographic Metho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Clifford, James

1986a Partial Truths.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Pp. 1-26.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b On Ethnographic Allegory. *In*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Pp. 98-121.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llier, John Jr., and Malcolm Collier

1967 Visual Anthropology: Photography as A Research Method.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Collier, Malcolm

2009 Photographic Explora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In* Viewpoints: Visual Anthropologists at Work. Mary Strong, Laena Wilder, eds. Pp. 13-31.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Daston, Lorraine and Peter Galison

1992 The Image of Objectivity. Representations 40: 81-128.

Delaplace, Gregory

2019 More than Corpses, Less than Ghosts: A Visual Theory of Culture in Early Ethnographic Photography.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35(1): 37-49.

Edwards, Elizabeth

2002 Material Beings: Objecthood and Ethnographic Photographs. Visual Studied 17(1): 67-75.

2003 Talking Visual Histories: Introduction. *In* Museums and Sources Communities: A Routledge Reader. Alison Brown and Laura Peers, eds. Pp. 83-99. London: Routledge.

2011 Tracing Photography. *In* Made to Be Seen: Perspective on the History of Visual Anthropology. Marcus Banks and Jay Ruby, eds. Pp. 159-189.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2 Objects of Affect: Photography Beyond the Ima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1: 221-234.

Glass, Aaron, Judith Berman, and Rainer Hatoum
2017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on and Digital Media in (Re)making Boas's 1897 Book. Museum Worlds: Advances in Research 5: 108-132.

Grasseni, Cristina
2007 Skilled Vis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Breeding Aesthetics. Social Anthropology 12(1): 41-55.

Griffiths, Alison
2002 Knowledge and Vis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Anthropology. *In* Wondrous Difference: Cinema, Anthropology, and Turn-of-the-Century Visual Culture. Pp. 86-123.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rimshaw, Anna
2001 The Ethnographer's Eye: Ways of Seeing in Modern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evia, James L.
2009 The Photography Complex: Exposing Boxer Era China (1900-1901), Making Civilization. *In* Photographies East: The Camera and Its Histor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Rosalind C. Morris, ed. Pp. 79-121.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owell, Signe
2018 Ethnography. *In*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Felix Stein, ed. Electronic document, http://doi.org/10.29164/18ethno. Acceessed September 13, 2021.

Joseph, Camille
2015 Illustrating the Anthropological Text: Drawings and Photographs in Franz Boa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ecret Societies of the Kwakiutl Indians (1897). *In* Texts, Transmissions, Receptions: Modern Approaches to Narratives. André Lardinois, Sophie Levie, Hans Hoeken, Christoph Lüthy, eds. Pp. 221-239. Leiden: Brill Publishers.

Kaneko, Erika
1981 Inez de Beauclair: 1897-1981. Asian Perspectives 24(1): 91-95.

Kano, Tadao and Kokichi Segawa 鹿野忠雄、瀨川孝吉
1956 An Illustrated Ethnography of Formosan Aborigines, Vol. 1: The Yami. Tokyo: Maruzen Co.

Kopytoff, Igor
1986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Arjun Appadurai, ed. Pp. 64-9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per, Adam

1977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British School, 1920-1970. Harmondsworth: Penguin.

MacDougall, David

1997 The Visual in Anthropology. *In* Rethinking Visual Anthropology. Marcus Banks and Howard Morphy, eds. Pp. 276-295.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alinowski, Bronislaw

1922 The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New York: E. P. Dutton.

1967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London: Athlone Press.

Moeran, Brian

2016 The Craft of Editing: Anthropology's Prose and Qualms. *In* The Anthropologist as Writer: Genres and Context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elena Wulff, ed. Pp. 60-72.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Niska , Barbara Turk

2011 Some Thoughts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and Photography. Studia Ethnologica Croatica 23: 125-148.

Pinney, Christopher

1990 Classification and Fantasy in the Photographic Construction of Caste and Tribe. Visual Anthropology 3(2-3): 259-288.

1992a The Parallel Histories of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In* Anthropology and Photography 1860-1920. Elizabeth Edwards, ed. Pp. 74-95.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b The Lexical Spaces of Eye-spy. *In* Film as Ethnography. Peter Crawford and Davis Turton, eds. Pp. 26-49.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Renov, Michael

1986 Re-thinking Documentary: Towards a Taxonomy of Mediation. Wide Angle 8 (3/4): 71-77.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51 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Six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Sekula, Allan

1975 On the Invention of Photographic Meaning. Artforum 13: 36-45.

Stylianou-Lambert, Theopisti

2019 Photographic Ecosystem and Archives. Photographies 12(3): 375-394.

Staveník, Adam
2015 From Illustration to Photo-ethnography: Photography as a Key Component of Ethnographic Publications. *In* Doing Research, Making Science: The Memory of Roma Workers. Kateřina Nedbálková, Kateřina Sidiropulu Jank, eds. Pp. 99-114. Brno: CDK.

Young, Michael W.
1999 Malinowski's Kiriwina: Fieldwork Photography 1915-1918.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林文玲
115601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wandern@gate.sinica.edu.tw

附錄　11本中研院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列表

民族所專書專刊甲種編號	書刊名	出版年	作者	內文頁數	照片頁數	照片數量	備註
專刊之一	蘭嶼雅美族的社會組織	1962	衛惠林與劉斌雄	167	22	24	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二	馬太安阿美族的物質文化	1962	李亦園等著	461	54	213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五	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上冊 第一章 導論 第二章 社化過程 第三章 社會群體 第四章 制度典章 第五章 超自然觀念	1963	李亦園、徐人仁、宋龍生、吳燕和	1-312	20	46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六	南澳的泰雅人：民族學田野調查與研究下冊 第六章 物質文化 第七章 經濟生活 第八章 個人生命史 第九章 結論	1963	李亦園、石磊、阮昌銳、楊福發	313-712	21-45	58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七	布農族卡社群的社會組織	1966	丘其謙	266	6	12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八	秀姑巒阿美族的社會組織	1965	劉斌雄、邱其謙、石磊、陳清清	268	0	0	無照片圖版
專刊之十一	臺灣高山族的人口變遷 此研究不屬民族所田野調查計畫	1967	王人英	280	0	0	無照片圖版
專刊之十七	臺灣土著族的文化、語言分類探究：魯凱排灣卑南三族群的比較研究 此研究不屬民族所田野調查計畫	1969	Raleigh Ferrell 費羅禮	444	0	0	無照片圖版
專刊之十八	大港口的阿美族上冊	1969	阮昌銳	216	14	46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十九	大港口的阿美族下冊	1969	阮昌銳	217-415	12	41	未附圖版目錄
專刊之二十一	筏灣：一個排灣族部落的民族學田野調查報	1971	石磊	193	22	40	附圖版目錄

林文玲製表

Tracing the Social Biography of the Archives of "Field Photos":

A Stud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duringin the Founding Period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Wen-ling Li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From August 1955 to April 1965,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went through 10 years of preparation, planning and formal establishment. During this period, it mobilized all the staff and conducted many encyclopedic field surveys on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ook nearly 5,000 black and white field record photos. The personnel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lso actively compiled various types of field materials, and published them in the forms of research papers or ethnological monographs. Most of the research papers were published in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while the ethnological monographs co-authored by the field investigators were classified as publications in the A category of the IOE monographs. The monographs and research papers were all based on the rich field materials collected from the aforementioned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they adopted the images taken during the fieldwork in many ways. The research writings of this period, through the synergy of text writing and photographic images, carried and revealed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fieldwork to varying degrees, and delivered speculation, conceptual discussion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n anthropological issue in the analysis and writing. All of this recorded and shaped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studies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as well as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institution's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ethnology. From August 1955 to April 1965,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t Academia Sinica underwent a decade of preparation, planning, and formal establishmen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Institute mobilized its entire staff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field surveys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resulting in nearly 5,000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s. The personnel involved in these field investigations also diligently compiled various field materials, which were later published as research papers or ethnological monographs. Most research papers appeared in th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while the ethnological monographs co-authored by the field investigators were classified as category A publications in the IOE monograph series. These monographs and research papers were all based on the rich field materials collected during the aforementioned field investigations, and they incorporated images taken during fieldwork in many ways. The research produced during this period, through the combined use of written texts and photographic images, conveyed the processes and results of fieldwork to varying degrees. These works also offered insights, conceptual discussions,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on anthropological issues through their analysis and writing. This body of work documented and shaped the study of Taiwan's Indigenous peoples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ethnology at the Institute.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back the initial figure of this academic construction, and slightly shifts th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rom the textual discourse as the center, instead focusing on the events and actors involved in the social biography of "field photos" from 1950 to 1960 and their interactive effects, to analyze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photos and images in the shaping of the discipline and its knowledge 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discipline visions that are revealed from them.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the early foundations of this academic construction, shifting the analytical focus from textual discourse to the events and actors involved in the social biography of "field photos" from the 1950s to 1960s and their interactive effects. It seeks to analyze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photos and images in shaping the discipline and its knowledge 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scientific and disciplinary visions that they reveal.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are the academic careers whose disciplinary identities and practices are tightly interwoven with the visual no matter what they experience in discursive trends, theoretical paradigm shift, and debate changes because of their emphases on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and field observation methods. Therefore, by sorting out the social biography of the "field photos"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60s, this paper intends to examine the intentions and the purposes for which these photographs/images were created and produced. Who photographed them, and how researchers at that time combined them, applied them to different

contexts, developed their research ideas or completed their arguments, and in what framework/medium were they assembled to become archives are the main research questions of this paper. To sort out the social biographical bias of these batches of "field photo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tell not only how ethnographic photography and "field photos" as objects are involved and become active in social relations, but also how through them and bringing them into the center of analysis can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obtain a kind of visualization, and then develop the research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the text-center and discourse-based method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studies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are academic fields whose disciplinary identities and practices are closely intertwined with the visual, regardless of the discursive trends, theoretical paradigm shifts, and changing debates they experience. This is due to their emphasis on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and field observation methods. Therefore, by tracing the social biography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s "field photos"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60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tentions and purposes behind the creation and production of these photographs and images. It considers who took the photographs, how researchers of that time combined and applied them in different contexts, how they developed their research ideas or supported their arguments, and in what framework or medium these images were assembled to become part of the archives? By exploring the social biography of these "field photos," this article not only reveals how ethnographic photography and "field photos" as objects become active participants in social relations but also demonstrates how centering these images in analysis offers a form of visualization that differs from text-based methodologies. This approach provides a distinct perspective on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Indigenous studies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Keywords: ethnographic photography, photo archives, social biography of things, skilled vision, visualization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studies